

九州清晏：清世宗全國龍神祠廟系統的創立*

陶金、喻曉

摘要

自雍正元年(1723)起,清世宗(1678–1735)以京師時應宮為中心,構建起一龐大的全國性龍神祠廟系統,在其執政的十三年中,所勅建的龍神祠廟多達三十餘座。他不但自己在時應宮中為受雨旱災害的地方祈福,並要求各地督撫將各省龍神神像迎請回屬地,建祠祈禱,一如時應宮之分支。本文將這些龍神祠廟分為:中央、各省、零禮、黃河、江海五個層面,通過分析各個層面龍神祠廟的建立背景、建築規制、祀典源流以及宗教活動,考察它們與國家重要政治方略的同步性與紀念碑性,並進而揭示作為「中國之主」的清世宗「日監在茲,感通尤捷」的宗教自信,以及通過「事神治人」來實現「九州清晏」的政治理想。

關鍵詞:雍正、龍王、祈雨、黃河、水患、國家祭祀、宗教建築

陶金,清華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中心項目負責人,法國EPHE在讀博士研究生,先後畢業於諾丁漢大學建築學院、芝加哥大學神學院,曾發表有〈茅山神聖空間歷史發展脈絡的初步探索〉,《世界宗教文化》,第3期(2015),頁131–147;〈大高玄殿的道士與道場:管窺明清北京宮廷的道教活動〉,《故宮學刊》,總第12輯(2014),頁185–205。

喻曉,清華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中心特約研究人員,先後畢業於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曾與陶金共同發表《明堂式道教建築初探——明世宗「神王」思維的物質載體》,《故宮學刊》,第2期(2016),頁177–198。

* 本文係根據2018年10月筆者於法國遠東學院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合辦的「十三至二十世紀中國的君權與皇家對宗教的支持問題北京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稿修訂而成。本文的完成得益於清華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中心曲爽先生的大力協助,並承蒙王崗教授、劉城教授、鞠熙教授、吳璠女士、馬驍先生、董立軍先生、徐輝副研究館員、齊曉瑾女士、劉陽先生、張繼州先生等師友支持,在此一併致謝。

引言

雍正五年(1727)七月十一日，清世宗頒佈了一道特殊上諭，要求各省督撫將他勅造的「各省龍神大小二像」迎回本地，供奉祭祀。¹ 至少有七省的方志中明確記載了「迎請龍神像」一事，至少有十三省的方志中記載了此年奉旨建造或重修龍神祠廟。而早在雍正元年，清世宗便已在京城西苑建造時應宮，供奉「順天佑畿時應龍神」及各省龍神，並設置了官方祭祀儀式。由此，一個由皇帝親自創建的、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的全國性龍神祠廟系統橫空出世。隨著時間推移，這一系統逐漸擴充、完善，相關宗教活動一直延續到清末，維持了近兩個世紀。

圍繞著清代國家祭祀中「祈雨」、典型的龍神崇拜個案等課題，學界已進行了廣泛研究。例如吳十洲深入研究了清世宗的繼任者清高宗(1711–1799)的祈雨實踐；² 王元林針對中國官方及民間的龍神、水神崇拜，進行了多方位研究；³ 和衛國圍繞錢塘江海塘工程，對清世宗的治水思想及「天人感應」思維進行了闡述；⁴ 李允碩系統闡述了清世宗在國家祭祀方面的態度；⁵ 博安德(Andreas Berndt)探討了中國人對龍的崇拜的起源與流變；⁶ 斯奈德·海因克(Jeffrey Snyder-Reinke)則通過對晚清地方政府祈雨行為的研究，探討了清代國家祭祀體系在全國

¹ 「十一日，奉上諭：龍神散佈霖雨，福國佑民，功用顯著。朕在京虔設各省龍神像位，為各省祈禱。今思龍神專司各省雨澤，地方守土大臣理應虔誠供奉。朕特造各省龍神大小二像，著該省督撫迎請，供奉本地，虔誠展祀。」《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五十九，《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本，1986)，第414冊，頁665上。

² 吳十洲：《帝國之雩：18世紀中國的乾旱與祈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³ 參見王元林、褚福樓：〈國家祭祀視野下的金龍四大王信仰〉，《暨南學報》，第2期(2009)，頁209–214；王穎、王元林：〈豫北地區水神信仰的變遷研究〉，《華北水利水電大學學報》，第5期(2014)，頁1–5；王元林：〈明清國家禮制中的四海祭祀〉，《探索與爭鳴》，第4期(2011)，頁73–78等論文。

⁴ 和衛國：〈「天神賜佑」與「盡人之力」：清世宗「天人感應」理念下的錢塘江海塘工程〉，《浙江海洋大學學報》，第3期(2012)，頁8–13。

⁵ 李允碩：〈雍正帝와清代國家祭祀〉，《명칭사연구》，第25期(2006)，頁171–211。

⁶ Andreas Berndt, "The Cult of the Longwang: Their Origin, Spread, and Regional Significance," in Philip Clart, ed., *Chinese and European Perspectives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s* (Taipei: Boyang Publishing, 2012), 61–94.

的影響力；⁷ 在建築方面，張劍葳以北京白浮泉龍王廟為例，提出了「水利設施——龍王廟」這一研究模型。⁸ 然而，學界關於清代全國性龍神祭祀體系的成因、作用、影響等方面的研究還較為欠缺。

本文通過對宮廷檔案、方志等文獻的挖掘，以及對現存清代龍神祠廟的建築和儀式的考察，探索清世宗創建這一全國性祭祀系統的內外原因，並由此揭示清世宗的國家與民族觀念，以及「九州清晏」的政治理想。

一、清前期的極端天氣、水患與人地矛盾

(a) 小冰期影響下的冷凍、雨旱等極端天氣

氣候史研究表明，中國自元代後期開始逐步進入小冰期 (Little Ice Age, LIA) 階段。與中世紀暖期 (Medieval Warm Period, MWP) 相比，小冰期除了氣溫下降和乾旱、淫雨、霜害、凍災等極端氣候外，還導致了糧食作物產量變少、糧食價格上升，造成全球各地頻繁出現饑荒與瘟疫。明末、特別是1580年後，中國氣候明顯轉寒變乾，水災、旱災、蝗災等自然災害的頻度及災度急劇增大，北方農區南退，農作物普遍減產，進而引發饑荒和社會動盪，助推朝代更替。⁹ 清朝時的中國依然處於全球範圍內的小冰期之中，在氣象學家對1550年到2000年中國溫度變化的類比結果中可以看到，康熙九年(1670)至五十四年(1715)和嘉慶十五年(1810)至道光二十年(1840)是兩個極端寒冷時期(參見圖1)。¹⁰ 清前期歷史文獻中有很多關於冷冬¹¹ 的記載，特別是順治十年(1653)和十一年，東中部地區連續兩年出現嚴

⁷ Jeffrey Snyder-Reinke, *Dry Spells: State Rainmaking and Local Governanc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

⁸ 張劍葳：〈白浮泉、都龍王廟與龍泉寺〉，收入陳薇等著：《走在運河線上——大運河沿線歷史城市與建築研究》(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3)，下冊，頁611-645。

⁹ 葛全勝等：《中國歷朝氣候變化》(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頁572。

¹⁰ 陳星、劉健、王蘇民：〈東亞地區小冰期氣候的模擬〉，《氣象科學》，第1期(2005)，頁1-8。

¹¹ 冬季溫度低於平均值1.5°C以上。

冬。江蘇、安徽、江西、兩湖、福建、兩廣等南方溫暖地區，亦出現了「大雨雪四十餘日」、「海凍不波官河水斷」、「淮冰河」、「太湖冰厚二尺」等嚴寒事件。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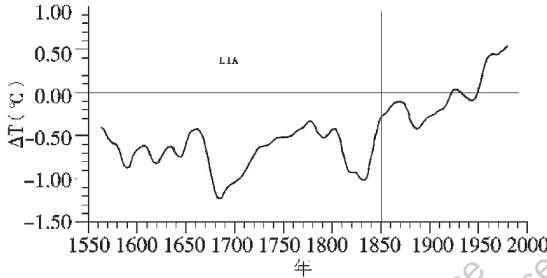


圖1 小冰期中國溫度變化類比 (ECHO-G)¹³

與冷冬相比，乾旱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更為巨大，所以帶來的社會影響也更為劇烈。清代留下了兩套世界上歷史最悠久、標準統一的觀測報告集。一是始於康熙三十二年、訖於宣統元年(1909)的《雨雪分寸》，一是始於康熙二十四年、訖於光緒三十年(1904)的《晴雨錄》。前者記錄內地18個行省及盛京將軍轄區共273個府(州、廳)的歷次降水的詳細情況，後者則記錄各州縣每日的天氣情況。¹⁴ 中央氣象局科學研究院(今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根據上述資料及方志等資料統計，清代旱災集中在順治二年到康熙二十九年、嘉慶五年到二十五年、光緒十六年到二十六年三個時間段，其中順治至康熙年間的乾早期是持續時間最長的(共45年)。此外，九個清代發生全國廣泛旱情的「極端大旱年」中，有兩個(康熙十年和康熙十八年)在此時期發生。¹⁵

對於全國大多數地區的雨旱情況，皇帝是通過奏摺來了解的。但京師的天氣狀況，卻能夠給皇帝帶來最直觀的感受，也更受重視。康熙二十三年春，京師發生旱情時，清聖祖就在上諭中擔憂地指出：「京師為天下根本之地，殊屬緊要。乃數月不雨，雖秋成尚遠，而目前旱

¹² 葛全勝等：《中國歷朝氣候變化》，頁607-608。

¹³ 陳星、劉健、王蘇民：《東亞地區小冰期氣候的模擬》，頁4。

¹⁴ 《晴雨錄》佚失較多，但北京、南京、蘇州、杭州四地保存較完整。

¹⁵ 葛全勝等：《中國歷朝氣候變化》，頁606。

乾，朕甚憂之。」¹⁶ 在清代統治的268年中，京師有163年發生過旱情，發生頻率為61%，是元代的三倍，比明代也高了5%。¹⁷ 清聖祖（1654–1722）在位的61年中，至少有34年，京師發生了乾旱。¹⁸ 其本人對旱情的體會非常深刻，康熙五十六年，他在給皇子及諸大臣的上諭中說：「京師處夏每少雨澤，朕臨御五十七年，約有五十年祈雨。」¹⁹

除乾旱外，清前期還出現了大範圍暴雨等更劇烈的極端氣候事件。其中比較典型的是雍正八年夏，黃淮地區連續半月以上的暴雨，個別地區、如山東境內，雨期甚至長達40天以上。持續強降雨引發海河、黃河、淮河、運河水水暴漲滿溢、部分河段發生決堤，百餘州縣受災。山東部分地區災後發生饑荒，甚至出現了「人相食」的慘劇。²⁰

(b) 黃河之患與沿海地區的風潮災害

黃河是華夏文明的搖籃，但頻繁的決口、改道也給下游25萬平方公里沖積平原上的居民帶來無盡災難。另一方面，清代政治中心在北方，但經濟中心卻在南方，每年需從江浙等南方八省徵收萬石左右的漕糧運抵京師，大運河成了國家的重要生命線。自元末黃河經泗水入淮以後，黃、淮、運三河交織於江蘇清口地區，黃河水患對漕運危害極大。故有「夫黃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運亦病」之語。²¹ 所以在明清兩代，黃河不單關係到國計民生，而且對首都的安定產生直接影響。

明清兩朝是歷史上黃河水患較為嚴重的時期。隨著中古以來黃河流域生產規模日益擴大，中上游自然環境破壞愈發嚴重，黃河攜帶泥沙日益增多，不斷淤積河道。再加上極端天氣多發，造成黃河決口頻率加快。從清初到鴉片戰爭爆發（1644–1840）近兩百年間，黃河決口361次，平均每六個半月就會發生一次。而在宋、元以前，平均決口

¹⁶ [清]《聖祖仁皇帝聖訓》，卷三，《四庫全書》，第411冊，頁182下。

¹⁷ 謝璞：《中國氣象災害大典·北京卷》（北京：氣象出版社，2005），頁9。

¹⁸ 同上註，頁28–31。

¹⁹ 《欽定皇朝通志》，卷三六，《四庫全書》，第644冊，頁398上。

²⁰ 張德二、梁有葉：〈1730年夏季黃淮地區暴雨極端事件研究〉，《氣候變化研究進展》，第5期（2016），頁407–412。

²¹ [民國]趙爾巽等：《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77），第13冊，頁3770。

間隔年限則為20–30年。²² 清軍入關後，黃河曾發生過三次三百年一遇的洪水，有兩次都發生在清前期，分別是康熙元年和乾隆二十六年（1761）。其中，發生在康熙元年秋季的那次尤甚。據史料記載，陝西、山西、河南三省黃河支流洪水匯集，幹流多處決口，並引發淮河大水，「漂沒人家無算」。²³ 清聖祖即位後十六年裡，黃河年年發生決溢。因此，他將「河務」與「三藩」、「漕運」列為亟需解決的「三大事」，²⁴ 並親自督辦河工，多次親臨黃河考察。在康熙朝的殿試策問題目中，也可以看到皇帝對黃河問題的憂心。如康熙九年、二十一年、三十年、三十三年、三十六年、三十九年殿試策問，都涉及黃河話題。

經過多年治理，到了康熙二十四年，黃河得到系統修治，決溢頻率明顯降低。然而在清聖祖生命的最後兩年，黃河接連在河南武陟發生決溢，給年邁的老皇帝帶來了巨大困擾。在去世前五個月，他還在為河南巡撫楊宗義懈怠河工而「日夜憂思」。²⁵ 雍正元年夏秋之際，黃河在中牟、武陟接連發生了三次較大決溢，給了剛剛繼位的清世宗一個「下馬威」。²⁶

黃河治理是清政府最為重要的工作任務之一，《清史稿》甚至有「首重治河」之說。²⁷ 明以前，黃河治理事務隸屬於工部。明代雖有專職治河官員，但並非常設。清代則從順治元年起就設置了河道總督，掌管黃河、大運河及永定河堤防、疏浚等事，直接受命於朝廷。雍正二年設置副總河職位，雍正七年，改為分設江南河道總督（駐清江浦）與河南山東河道總督（駐濟寧），次年又增設直隸河道總督，由直隸總督兼領。江南河道總督權勢很大，最高可以得到從一品的品秩，為歷代治河專官中的最高者。從中可以看到在清代，國家對黃河治理重視程度之高。

²² 陳志清：〈歷史時期黃河下游的淤積、決口改道及其與人類活動的關係〉，《地理科學進展》，第1期（2001），頁44–50。

²³ 姜榮升、李蓓蓓、李忠明：〈中國1662年水旱災害時空分佈重建〉，《農業考古》，第6期（2014），頁128–132。

²⁴ 「（康熙三十一年二月辛巳）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聽政以來，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夙夜靡念。曾書而懸之宮中柱上，至今尚存。』」[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五四，《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5冊，頁701上。

²⁵ [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二九八，《清實錄》，第6冊，頁884上。

²⁶ 饒明奇：《清代黃河流域水利法制研究》（鄭州：黃河水利出版社，2009），頁69。

²⁷ [民國]趙爾巽等：《清史稿》，卷一二六，第13冊，頁3715。

除黃河外，清代的風潮災害亦較為嚴重。據氣象學家研究，十七、十八世紀每十年就會發生風暴潮災害七到八次。²⁸ 中國歷史上有文字記載的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風暴潮災害，就發生在康熙三十五年六月的長三角地區，「漂沒海塘五千丈，灶戶一萬八千，淹死者共十餘萬人」。²⁹ 錢塘江沿岸是受風暴潮災害影響嚴重的地區，康熙三年八月，「大風海嘯」持續三日餘，沖虧海寧縣海塘2,380餘丈。雍正二年七月，江蘇、浙江遭遇特大風潮襲擊，「沿海人民溺死無算」。³⁰ 康雍乾三朝，朝廷以前無古人的魄力傾心治理風潮災害，耗費鉅資修築錢塘江海塘，合計用銀770多萬兩。³¹

(c) 膨脹的人口與短缺的耕地

清前期，由於社會安定，政府採取休養生息國策，康熙朝和雍正朝分別推行「盛世滋丁、永不升賦」和「攤丁入畝」的針對性政策，中國人口增長迅猛。康熙三十九年全國人口為1.5億，僅僅90年後的乾隆五十五年，這個數字就翻了一倍，達到3億。³² 為了適應人口增長，國家通過提高「升科」等經濟政策和各種「勸農」的文化宣傳，鼓勵人民開墾荒地，清世宗繼位後不久，甚至提出了「務使野無曠土」的極端口號。³³ 在這一背景下，耕地面積也有較大幅度提升，順治十八年，全國耕地面積526萬公頃，到雍正三年時已達890萬公頃。

然而，耕地的拓展速度遠不能與人口增速相匹配，受環境、技術等因素制約，內地平原地區的耕地很快就趨於飽和，而且到乾隆中葉以後，《清實錄》所載納稅土地面積就已經停止增長。清世宗在一篇勸農上諭中發出的慨歎點明了當時人口與耕地的矛盾——「我國家休養

²⁸ 楊桂山：〈中國沿海風暴潮災害的歷史變化及未來趨向〉，《自然災害學報》，第3期（2000），頁23–30。

²⁹ [清]董含：《三岡續識略》，卷上（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頁246。

³⁰ 和衛國：《治水政治：清代國家與錢塘江海塘工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頁1。

³¹ 同上註，頁403。

³² 嚴中平等：《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頁245。

³³ 《世宗憲皇帝聖訓》，卷二五，《四庫全書》，第412冊，頁335上。

生息，數十年來戶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數。」³⁴ 康雍乾三朝，糧食價格呈現上揚態勢。乾隆十三年，湖南巡撫楊錫紱（1701-1768）在奏疏中總結了米價的變化：「康熙年間……每石不過二三錢。雍正年間，則需四五錢。今則需五六錢，無復三四錢之價。」³⁵ 在「率天下農民竭力耕耘」³⁶ 才能保障糧食供應的情況下，水患與乾旱等自然災害對國家經濟社會的影響無疑十分巨大。由於極度開墾而導致的森林覆蓋率銳減，也進一步加劇了不利氣候和江河水患，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對於耕地不足的問題，國家可以採取鼓勵農耕、推廣玉米和紅薯等高產作物、開發山地耕種、糧食進口、遷徙民眾等方式；對於普通的水患，國家可以加強河道治理。但是對於嚴重的乾旱、澇災等極端天氣情況和較大的江河決口、改道等問題，當時的科學技術無法解決，求諸於祭祀等方式，成為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的一種必然選擇。

二、天人感應之際的清世宗

(a) 重建合法性的皇帝

一個新政權能夠長期維繫統治，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民眾的認可與接受程度。也就是說，政治統治必須以政治合法性為基礎。清以「異族」入主中原後，軍事上迅速控制了全國局勢，陸續消滅了南明、農民起義軍、三藩、台灣鄭氏等軍事威脅。然而漢滿兩族之間，受到的政治對立與鬥爭形勢的影響在國家安定後依然延續相當長時間，清代中前期一直是族群間剛性界限向柔性界限緩慢轉化的過程，其間伴隨的就是合法性的挑戰與補全之間的焦灼。此外，由於清世宗特殊的繼統過程，其個人的政治合法性亦遭到多方挑戰。

雍正六年發生了震驚朝野的「曾靜案」。清世宗親自通過書面形式審訊曾靜（1679-1735），並撰寫了多篇具有總結性質的上諭。該案的大部分文獻，甚至呂留良（1629-1683）等相關反清人士的言論，都被編在《大義覺迷錄》一書中。讓我們得以一窺當時民間對於滿人政權統

³⁴ 《世宗憲皇帝聖訓》，卷二五，《四庫全書》，第412冊，頁335上。

³⁵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三一，〈清實錄〉，第13冊，頁12287。

³⁶ 《世宗憲皇帝聖訓》，卷二五，《四庫全書》，第412冊，頁335上。

治中原的合法性、清世宗繼承大統的合法性、清世宗執政風格與生活作風的合法性的質疑，更可以了解清世宗的辯護。

曾靜「逆書」稱滿人原本是居於「四塞傾險而邪僻者」的夷狄，後來「竊天位汗華夏，如強盜劫去家財，復將我主人趕出在外，佔據我家」。清世宗則指出，漢文化中的聖王也並非都是中原人，稱「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他進一步從空間維度說明，「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³⁷ 清世宗最終將韓愈（768–824）《原道》中的話加以改造，拋出「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³⁸ 的定論，為清王朝樹立了「為中華之主」的合法形象。³⁹

曾靜「逆書」稱清世宗繼位過程極不光彩，有「謀父」、「逼母」、「弑兄」等嫌疑。清世宗針對這一指責，使用了大篇幅上諭進行反擊。其中不但詳細敘述了自己繼統的全過程，還具體列舉了幾位參與奪嫡皇子的「惡行」，使用了各種近乎謾罵的負面評價，對自己則使用了「諸兄弟之才實不及朕」的自誇描述。為證明在繼統過程中並無過錯之處，世宗甚至不惜將各種宮廷秘辛公之於眾，在上諭中記錄了大量敵對皇子的言行細節。⁴⁰

(b) 作為宗教專家的皇帝

清世宗在漢地佛教界被認為是一個「開悟者」，即便是到了清末、民國時期，這種推崇依然很盛。民國高僧釋印光（1862–1940），甚至稱他是「法身大士，乘願再來。握權實不二之道柄，度輪回無依之眾生者」。⁴¹ 中國歷代崇信佛教的皇帝甚多，但能夠獲得後世高僧如此讚譽者十分罕見。清世宗得到佛教界推崇的原因，首先是因為他從潛邸

³⁷ [清]胤禛：《大義覺迷錄》，卷一（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1999），頁5。

³⁸ 韓愈原文作「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³⁹ 張森、杜常順：〈清代中前期國家認同建構探析〉，《民族論壇》，第8期（2016），頁45–48。

⁴⁰ [清]胤禛：《大義覺迷錄》，卷一，頁21–28；卷三，頁283。

⁴¹ [民國]釋印光：《印光法師文鈔》（成都：巴蜀書社，2015），第2冊，頁51。

時期開始就對佛教、特別是禪宗確有深入研究與實修，這些在他於雍正十一年刊行的《御選語錄》中可見一斑。其次是他對禪宗先疑後信，致力於調和宗教、五家、禪淨。他還直接參與了對臨濟宗三峰派漢月法藏禪師(1573-1635)之觀點的打擊，並編撰了《御製揀魔辨異錄》一書對該派「外魔知見」進行了批判，⁴² 對恢復禪宗早期精神發揮了一定作用，故為後世禪宗主流稱道。

在道教方面，清世宗也有較為深入的了解和實踐。在《藩邸集》中，有《贈羽士》二首、《群仙冊》十八首，記錄了他登基前與道士的交往以及對道教所推崇的境界的嚮往。⁴³ 前文提及的主要收錄佛教文字的《御選語錄》中，亦收錄有張伯端(897-1082)、婁近垣(1689-1776)等高道的文字。清世宗認為道教「所用經籙符章，能祈晴禱雨，治病驅邪，其濟人利物之功驗，人所共知」。⁴⁴ 雍正八年，清世宗接連遭遇變故，二月大病一場，五月怡親王(1722-1778)病故，八月京師大地震，導致他寄予更多希望在道教。他曾委託岳鍾琪(1686-1754)、憲德(?-1740)、田文鏡(1662-1733)、鄂爾泰(1677-1745)、李衛(1688-1738)等地方大員尋訪民間法術高超的道士、方士，並陸續請來賈士芳、婁近垣、張太虛、王定乾等道士入宮。⁴⁵ 他還在短時間內，於紫禁城養心殿、乾清宮、圓明園深柳讀書堂等處設立了七座斗壇。⁴⁶ 活躍於康雍時期的宮廷畫師焦秉貞(生卒年不詳)所繪《宮廷道場圖》描繪的極有可能就是婁近垣為皇室成員斗禳病的情景(參見圖2)。

⁴² 楊航：〈從雍正對明清之際禪門一場持久鬥爭的干預看宗教管制的必要性及其尺度〉，《宗教學研究》，第2期(2014)，頁145-150。

⁴³ 李國榮：〈雍正與丹道〉，《清史研究》，第2期(1999)，頁83-89。

⁴⁴ [清]婁近垣：《龍虎山志》，卷一，《藏外道書》(成都：巴蜀書社，1994)，第19冊，頁427上。

⁴⁵ 關於雍正崇道的討論，參見楊海英：〈清前期的道教與宮廷〉，《道家文化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第二十三輯，頁400-409。

⁴⁶ 王子林：〈雍正帝所建斗壇與燒丹考〉，《故宮學刊》，第2期(2014)，頁207-213。



圖2 焦秉貞繪，《宮廷道場圖》
 (美國亞瑟·M·賽克勒美術館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藏)

雍正九年後，清世宗拆除了宮中的部分斗壇，卻在煉丹方面傾注了大量精力。他自潛邸時起，就對內外丹感興趣，例如推崇內丹南宗祖師張伯端，封他為「大慈圓通禪仙紫陽真人」，並敕命在張伯端的故里建造道觀以為崇祀。⁴⁷ 在外丹方面，清世宗寫作《燒丹》詩一首，⁴⁸ 內務府造辦處的檔案與清高宗登基後驅逐宮中煉丹道士的上諭，都反映了清世宗晚年在宮中和圓明園的煉丹情況。⁴⁹

清世宗對宗教有如此大的熱情，卻沒有出現過宗教干涉政治或明顯偏袒某一宗教的情況。在儒、釋、道三教關係方面，清世宗提出了

⁴⁷ 王卡：〈雍正皇帝與紫陽真人——兼述龍門派宗師范青雲(上)〉，《宗教學研究》，第1期(2013)，頁22-39；〈雍正皇帝與紫陽真人——兼述龍門派宗師范青雲(下)〉，《宗教學研究》，第2期(2013)，頁1-14。

⁴⁸ 詩云：「鉛砂和藥物，松柏繞雲壇。爐運陰陽火，功兼內外丹。光芒冲斗耀，靈異衛龍蟠。自覺仙胎熟，天符降紫鸞。」收於《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卷二七，《四庫全書》，第1300冊，頁207下。

⁴⁹ 王子林：〈雍正帝所建斗壇與燒丹考〉，頁219-224。

「異用同體」的觀點，較之「割裂三教」或「片面混同」三教的觀點更為融通。⁵⁰ 值得一提的是，雍正五年夏，清世宗在接見郎世寧(1688–1766)等天主教傳教士時，論述了他對宗教的觀點，這些話被記錄在了傳教士的信中。⁵¹ 他表示，天主教的好處與缺點，在中國各宗教中也都存在，各宗教中都有荒唐的地方；天主教和儒家、佛教一樣，艱深教理無法被普羅大眾理解，而大談天堂、地獄則只不過是為了「欺騙小民」。

總體來看，清世宗在宗教方面涉獵廣泛，對佛教、道教都有接觸，甚至對於民間教派亦有著獨特的理解，⁵² 其在處理宗教事務方面行事果斷，擁有相當的理性與自信。

(c) 釋讀災異祥瑞的皇帝

「災異」和「祥瑞」是中國傳統的政治理論和政治文化，對古代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產生了深刻影響，以至於正史之中多有相關章節專門記載災祥事件。災祥是「人天感應」的重要表現形式，該理論之集大成者董仲舒(前179–前104)在其《春秋繁露》中總結出了「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回應而起也」的規律。⁵³ 因此，災祥也成了一個政權合法性的重要影響因素。曾靜的「逆書」中，就提及中原在滿洲人統治之下發生了各種災異，如「寒暑易序、五穀少成」，「山崩川竭、地暗天昏」，「孔廟既毀、朱祠復災」等。⁵⁴

作為一個意圖重建政治合法性的君主，清世宗必須在災祥之事上獲得主動權。因此，對災祥的解釋權就必須牢牢掌握在手中。對於災異，他往往用三種方式應對，一是證明某災異事件為虛構或故意誇

⁵⁰ 塚本俊孝：〈雍正帝の儒仏道三教一体観〉，《東洋史研究》，第18卷，第2號(1959)，頁18。

⁵¹ 耶穌會士宋君榮(Antoine Gaubil)寫於1727年7月21日的信，錄於杜文凱編：《清代西人見聞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頁145–147。

⁵² 清世宗曾於奏摺中批云：「但應禁止邪教惑眾，從未有禁人吃齋之理。」可見其對於民間教派管理思想之理性。按馬西沙先生所言，雍正朝對民間教派「寬嚴並重」，與之後乾隆諸朝相較，「十分寬鬆」。參見馬西沙：〈清代康、雍、乾三朝對民間宗教的政策及其後果〉，《世界宗教研究》，第5期(2016)，頁11–22。

⁵³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75。

⁵⁴ [清]胤禛：《大義覺迷錄》，卷一，頁45–46。

大；⁵⁵ 二是稱某災異事件其實是可以接受的自然現象；⁵⁶ 三是某災異事件是發生地民風不佳或地方官劣跡所致。⁵⁷

清世宗在上諭中屢稱「朕從來不言祥瑞」，然而這句話後面往往就是一篇關於祥瑞的記述。他對地方官奏報的祥瑞事件並非照單全收，他認可的主要具有兩個特徵，一是範圍廣、影響大的事件。如雍正四年、五年間的「黃河清」，清世宗立《黃河澄清碑》並自撰碑記，將這一瑞應的原因歸結為自己「祇若昊天，敬慕皇考，翼翼小心，夙夜罔有懈怠」。⁵⁸ 二是與其重要政策相關的事件。雍正五年，清世宗即宣佈不再接受各省奏報「嘉禾」瑞應，⁵⁹ 但雍正十二年，他還是為湖廣鎮守總兵官楊凱奏報的一份嘉禾事件上諭內閣，⁶⁰ 因為這次嘉禾出現在雍正八年剛剛歸順的苗民田地中，是對改土歸流政策上合天心的一次重要宣傳。

(d) 修省與祈禱的皇帝

「神聖君權」是「君權神授」更進一步的體現，是前現代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政治現象。西歐中世紀英法等國君主是從天主教會分享權力的，由於教會壟斷祭祀的權柄，所以這些君主的構建自身神聖性的時候往往選擇一些「超自然現象」的方式，例如法國君主「觸摸治療瘰癧病」。馬克·布洛赫 (Marc Léopold Benjamin Bloch) 在《國王神跡：英法王權所謂超自然性研究》(*The Royal Touch: Monarchy and Miracles in France and England*) 中詳盡分析了這一課題。雅克·勒高夫 (Jacques Le Goff) 在《聖路易》(*Saint Louis*) 一書中，亦介紹了路易九世觸摸治病的事例。與歐洲君主不同的是，中國君主的權力不

⁵⁵ 「『逆書』則云山崩川竭，試問此數年崩者何山，竭者何川？」，[清]胤禛：《大義覺迷錄》，卷一，頁46。

⁵⁶ 「夫天時水旱，關乎氣數，不能保其全無，所恃人力補救耳。」，[清]胤禛：《大義覺迷錄》，卷一，頁45。

⁵⁷ 「但思天下人民眾多良頑不一……每見一州一縣之中相隔不遠而雨澤多寡不均、收穫豐歉各異，此即顯而可見者。」《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十八，《四庫全書》，第415冊，頁610上。

⁵⁸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卷十五，《四庫全書》，第1300冊，頁117下。

⁵⁹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六二，《四庫全書》，第414冊，頁706下。

⁶⁰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四八，《四庫全書》，第415冊，頁740上。

是從宗教分享來的，所以也不用採取一些近乎巫術的方式來證明自己。中國君主不但「對萬物的秩序負有責任」，而且擁有對天地神祇和祖宗的獨佔的祭祀權。只有得到皇帝的授權後，宗室、官員才有資格代表他去實施這些祭祀。

清世宗非常熱衷於親自履行祭祀權益，事實上早在康熙末年，他就已經代清聖祖舉行國家祭祀。⁶¹ 清世宗在執政的十三年中，不但經常親自參與祭祀，還大力推動了清代國家祭祀系統的建構工作，他在各地大量增修、翻修文廟，提升地方性祭祀的地位，削弱其地方個性。⁶²

針對各種災異，特別是旱澇問題，清世宗在國家祭祀之外會進行「私人祈禱」。在被清世宗編入《大義覺迷錄》的曾靜懺悔文《歸仁說》中，對之有生動描述——「偶聞一處旱澇，即憫念憂形，減膳之下，殫精竭誠，為民祈禱。」⁶³ 在祈禱後，如有應驗，清世宗往往會專門上諭內閣，闡述一番「天人感應，捷於影響」的道理。如雍正三年的一篇上諭中，他特別記述了自己為山西平陽、河南開封的旱情祈禱，結果僅僅兩日後，兩地都喜降甘霖。⁶⁴ 為了使祈禱更易應驗，清世宗亦效法商湯「桑林之禱」，⁶⁵ 在祈禱之前，先「內省身心之過愆，外考政治之闕失」。⁶⁶ 他認為「修省」是祈禱成功的必要條件，並要求封疆大吏、司牧之官、居民人等，「亦當恐懼修省交相勸勉」。⁶⁷

龍神是清世宗為旱澇災害而祈禱的主要對象。雍正六年，他在對內閣的一篇上諭中表示：「頻年以來，朕虔祀龍神福庇蒼生，歷有明驗。」⁶⁸

⁶¹ 《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一，《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7冊，頁31上。

⁶² 李允碩：〈雍正帝與清代國家祭祀〉，頁171-211。

⁶³ 曾靜《歸仁說》，收入[清]胤禛：《大義覺迷錄》，卷三，頁360。

⁶⁴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三一，《四庫全書》，第414冊，頁272上。

⁶⁵ 《呂氏春秋·順民篇》：「昔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磨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許維通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卷九（北京：中華書局，2009），上冊，頁200。

⁶⁶ 《世宗憲皇帝聖訓》，雍正三年乙巳四月戊寅，卷八，《四庫全書》，第412冊，頁119上。

⁶⁷ 同上註。

⁶⁸ 《世宗憲皇帝聖訓》，雍正六年戊申二月丁亥，卷三十二，《四庫全書》，第412冊，頁425上。

三、清世宗的龍神祠廟系統

自雍正元年始，清世宗便著手在京師與地方營造一系列的龍神祠廟。這些祠廟並非孤立存在，而是與前代皇帝勅修的河海神祠，甚至山嶽神祠，共同組成更為龐大且系統的國家祭祀網路。下文僅就清世宗親自創建的龍神祠廟系統，依五個層面做一遍覽，以期理解這些祠廟的創立背景，清世宗對祀典的構思，以及他在不同社會層面的儀式活動。下文所舉祠廟中，並非全部以龍神冠名，但因為清世宗在京師時應宮中，以龍神的位格來供奉四海、四瀆，故而本文將這些祠廟也納入廣義的龍神祠廟系統之中。此外，京師內的大小龍神廟，⁶⁹ 如新街口龍王廟、⁷⁰ 永定河惠濟廟、⁷¹ 海澱黑龍潭，⁷² 京師外的天津海神廟⁷³ 等，都曾蒙世宗勅命創建或重修，但因它們並非龍神祠廟系統的骨幹部分，或並非清世宗始建，故而暫不進行深入討論。此外，在雍正王朝的十三年中，清世宗共勅封河、海、龍、海塘等水神共28位（見附表），這還不包括我們後面會談到的各省龍神。考慮到雍正一朝前後僅十三年，其勅封水神之頻率堪居歷代帝王之首。⁷⁴

⁶⁹ 按韓書瑞 (Susan Naquin) 的統計，明清以來，北京共有龍王廟55處，從祀龍王的廟宇9處，共計64處。她還大致介紹了皇家園林中以及城外7處祈雨龍神祠廟的大致情況。參見Susan Naquin,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37, 315, 329。

⁷⁰ 又名龍神祠、龍興洛伽寺，雍正七年，清世宗發帑勅建，乾隆十八年，奉旨易蓋黃琉璃瓦，二十八年，奉勅重修，由僧人住持。參見呂敏 (Marianne Bujard) 主編：《北京內城寺廟碑刻志》(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第3卷，頁353。

⁷¹ 永定河原有河神廟，康熙三十七年(1698)，清聖祖勅建於盧溝橋北。雍正七年冬，清世宗以「比年以來，永定河安流順軌，無沖蕩之虞，民居樂業，歲獲有秋」，命怡親王於上游石景山之龐村創建惠濟廟。參見《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卷十四，《四庫全書》，第1300冊，頁127上。

⁷² 海澱黑龍潭是京師地區祈雨的重要壇所，康熙二十年(1681)，清聖祖曾重建祠廟並御製碑文，雍正二年，清世宗又勅重修，參見孫夢迪：〈淵潭神話·龍王信仰·黑龍潭祈雨——《清史稿》神話歷史研究案例〉，《百色學院學報》，第2期(2018)，頁17-24。

⁷³ 天津海神廟主奉天后聖母，原址位於塘沽海河南岸天津船廠廠區內，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聖祖勅命重修並御製碑文，雍正三年，清世宗又勅重修並御製《天津海神廟碑文》。參見《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卷十四，《四庫全書》，第1300冊，頁115下。

⁷⁴ [清]昆岡等：《(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四四三(光緒二十五年刻本)，頁五下至頁九上。

(a) 中央層面

1. 時應宮：宮中親禱壇所

(i) 創立始末

時應宮⁷⁵是清世宗以降宮廷供奉龍神並祈禱雨晴的壇所，這是清世宗龍神祠廟系統中第一個完工的項目。它坐落於大內西苑中海之福華門內，金龜玉螭橋西南隅，是北海、中海相分之處，也是西安門內直達神武門的要衝，同時也正好是紫禁城的西北隅，⁷⁶恰好又與清世宗勅建的內城隍廟（宮城城隍廟）、永佑廟（皇城城隍廟）位於同一緯度（參見圖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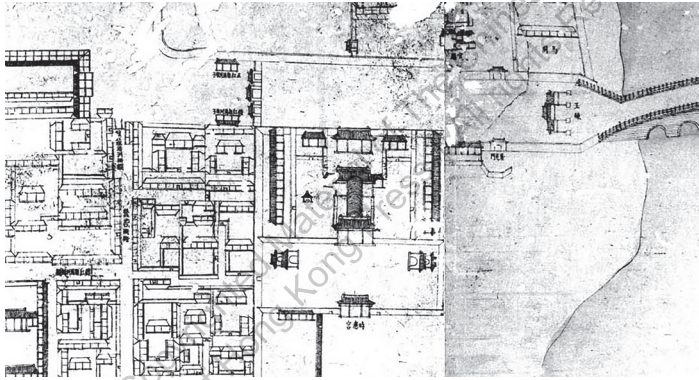


圖3 《乾隆京城全圖》中所顯示的時應宮位於金龜玉螭橋之西南

據《大清會典事例》所錄雍正元年一無具體日期之諭旨曰：「雍正元年奉旨：以西苑紫光閣北前後殿，改建為時應宮。欽此。」⁷⁷時應

⁷⁵ 關於時應宮及風雲雷雨四廟，參見傅育紅：〈清代皇城祈雨廟〉，《北京檔案史料》，第2期（2006），頁219–226。

⁷⁶ 關於紫禁城西北隅的宗教重要性，參見王子林：〈玄極寶殿新證〉，《故宮學刊》，第2期（2013），頁193–209；以及陶金、喻曉：〈明堂式道教建築初探——明世宗「神王」思維的物質載體〉。

⁷⁷ [清]昆岡等：《（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一八六（光緒二十五年刻本），頁十一下。相關記錄還可參見[清]高宗弘曆：《欽定皇朝通典》，卷四十二，《四庫全書》，第625冊，頁244下；[清]《皇朝文獻通考》，卷九十七，《四庫全書》，第634冊，頁178下。

宮的營造大約歷時一年，於雍正二年完工，⁷⁸ 雍正五年，清世宗先將中殿的十七省龍神移送各省建祠供奉，然後「增修後殿，以奉八方龍神」。⁷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現保存有清內務府所製各省龍神圖樣一套，⁸⁰ 當即是應宮創建之初，內務府所繪並上呈御覽的龍神造像圖樣。這套龍神圖樣共計 18 張，包括京畿、奉天以及各省龍神，⁸¹ 繪製精美，右上角貼有題籤，標明其在時應宮殿堂內的空間序列，以及某省某某龍神之名號（參見圖 4）。根據圖像所見，「順天佑畿時應龍王」與其他各省龍神服飾相同，均為通天冠、朝服、捧圭版之像。



圖 4 時應宮京畿及各省龍神像圖樣（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民國以來，時應宮曾被改為「大總統府衛隊兵舍」，⁸² 日偽期間，曾是「臨時政府侍衛處」。⁸³ 其中的十七尊龍神諸像，即四海、四瀆、

⁷⁸ 清高宗所作《時應宮記》記載了雍正二年，清世宗於時應宮禱雨。[清]鄂爾泰，張廷玉：《國朝宮史》（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頁 339–340。雍正二年，勅封四海龍神，且只見安奉於時應宮，故而推測其勅封應與建築羅成是同步之事。[清]昆岡等：《（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四四三（光緒二十五年刻本），頁五下。

⁷⁹ [清]高宗弘曆：《欽定皇朝通典》，卷四二，《四庫全書》，第 642 冊，頁 509 下。

⁸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廣州市國家檔案館：《清宮廣州檔案圖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頁 152–153。

⁸¹ 根據題籤可知各龍神排序從東至西為：（1）貴州，（2）廣西，（3）福建，（4）湖南，（5）江西，（6）陝西，（7）山東，（8）江南，（9）順天，（10）奉天，（11）山西，（12）河南，（13）浙江，（14）湖北，（15）四川，（16）廣東，（17）雲南，（18）邊外。

⁸² 全冰雪：《解說老北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頁 23。

⁸³ 智效民：〈中南海曾經是公園〉，《炎黃春秋》，第 6 期（2009），頁 64。

京畿和八方龍神，被移往金龜玉螭橋另一端的萬善殿后排房存放，後經整修，辟為龍神祠。⁸⁴ 德國女攝影師莫理循 (Hedda Morrison) 以及美國 *Life* 雜誌攝影師德米特里·凱瑟爾 (Dmitri Kessel) 曾在那裡拍攝過它們的照片，這些龍神大多頭戴冕旒 (而非通天冠)，手捧圭板 (參見圖 5、6)。解放初期，時應宮成為國務院幼兒園所在地，⁸⁵ 其建築在之後的中南海改造中被徹底拆除。



圖 5 莫理循所攝民國時期萬善殿龍神堂內的龍神像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圖 6 凱瑟爾所攝民國時期萬善殿龍神堂內的龍神像 (美國 *Life* 雜誌)

⁸⁴ 黃奮：《三海全詠》(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頁 76。

⁸⁵ 《國務院幼兒園條》(2012 年 11 月 2 日)，<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8A%A1%E9%99%A2%E5%B9%BC%E5%84%BF%E5%9B%A D/9665325?fr=aladdin>，2018 年 8 月 29 日查閱。

(ii) 建築規制

據《乾隆京城全圖》所示，時應宮所佔基地約為83米（約合清營造尺之二十六丈）見方的方形地塊，中軸線上分別為山門、前殿、中殿、後殿，皆為單簷歇山式建築。其中山門內東西兩側有鐘、鼓二樓。前殿懸清世宗御匾「瑞澤霑和」，其與中殿之間，由穿堂連接，形成一「工字殿」的格局。工字殿西側，為一井亭。雍正五年所增建的八方龍神殿位於時應宮最後，兩側以高牆圍繞，形成一處相對獨立的院落，暗示著其私密性與重要性。此外，時應宮門口的幡杆號稱宮中之最，高達六丈七尺五寸（約22.5米），⁸⁶ 其樣式應與《圓明園四十景圖》中所見瑞應宮幡桿相似。兩側幡桿懸掛黃緞龍旗兩面，長一丈一尺六寸，寬一丈。⁸⁷

時應宮的建築佈局特色之一，在於其突破了傳統的回廊庭院式佈局，主殿（即中殿）前之東西兩側不設配殿，反而以穿堂與前殿相連，這種作法常見於宮殿與神祠中的「前朝後寢」。⁸⁸ 這種獨特的設計應是突出了前殿與中殿之間所奉神明的一體性或至少是緊密聯繫：「前殿奉四海、四瀆龍神，後殿中奉『順天佑畿龍神』，兩旁左右奉十有七省龍神。」⁸⁹ 清末史學家陳作霖（1837–1920）曾造訪時應宮，稱其「屋宇幽深，不寒而慄」，⁹⁰ 這正是工字殿內部空間的特徵（參見圖7）。

⁸⁶ [清]黃浚：《花隨人聖庵摭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2冊，頁594。

⁸⁷ [清]福瑞：《為支領彩畫時應宮旗杆上所掛黃緞龍旗》，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內務府檔案，05-08-006-000678-0027（道光二十三年）。

⁸⁸ 「工字殿」為古代帝王宮殿之規制，即「前朝後寢」，宋代以來的神祠建築多採用這一人世建築空間，如北京東嶽廟的工字殿應係元代舊制。

⁸⁹ [清]高宗弘曆：《欽定皇朝通典》，卷四十二，《四庫全書》，第642冊，頁509下。

⁹⁰ [清]陳作霖：《可園文存》，卷九，《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736冊，頁七五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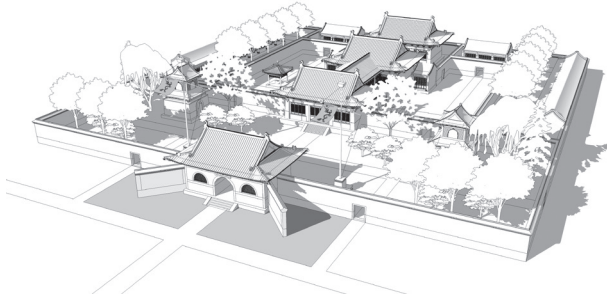


圖7 時應宮建築復原圖(陶金、董立軍繪製)

2. 瑞應宮：離宮親禱壇所

(i) 創立始末

圓明園內的瑞應宮⁹¹是專供清世宗在離宮居住時向龍神祈禱的壇所，位於園內的綜合性宗教活動空間「佛樓」⁹²東部，包含有玉皇殿、太歲壇、斗壇、關帝殿、極樂世界、楞嚴壇、瑞應宮等場所。瑞應宮，又稱龍神廟，《日下舊聞考》稱：「瑞應宮諸殿皆祀龍神。」⁹³其創立過程缺乏檔案記錄，雍正四年六月，清世宗曾御書「瑞應宮」、「和感殿」、「晏安殿」等匾額，⁹⁴推測其土木營造應於當年內告竣。

除瑞應宮外，圓明三園（即圓明園、長春園、綺春園）內還有九處奉祀龍神，⁹⁵其中，「慈雲普護」祀「圓明園昭福龍神」，其創建年代可追溯至清世宗登基之前（彼時為雍親王私園），「北遠山村」龍王廟建於雍正十一年，「四宜書屋」附近的船塢內也在同年供奉「風、雲、雷、雨」神位（參見下文風雲雷雨神祠）。這三處祠廟雖然都是清世宗親創，體現了其對龍神崇祀之重視，但這些龍神僅為圓明三園之龍神而非國

⁹¹ 有關圓明三園內所有祠廟的系統梳理與研究，詳見賈珺：〈圓明三園中的祀廟祠宇建築探析〉，《故宮博物院院刊》，第3期（2012），頁109-128。

⁹² 乾隆九年改稱「日天琳宇」，為清高宗於乾隆元年所歸納的「圓明園三十三景」（後為「圓明園四十景」）之一。

⁹³ [清]于敏中：《日下舊聞考》，卷八一（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第4冊，頁1355。

⁹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代檔案史料——圓明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頁1176。

⁹⁵ 賈珺：〈圓明三園中的祀廟祠宇建築探析〉，頁109-128。

家層面者，故而在這不多討論。其他六處龍神祠廟，大都創立於清世宗之後，是後世帝王對於龍神祀典的延續發展，在此亦不著筆墨。⁹⁶

(ii) 建築規制

乾隆初年所繪製的《圓明園四十景圖》基本反映了雍正時期瑞應宮的建築風貌：其前為一圓洞式山門，門內左右高聳幡杆，「前為仁應殿，中為和感殿，後為晏安殿」(參見圖8)。⁹⁷ 這種三進殿的佈局與拓建後的時應宮十分相近，除無穿堂外，僅是在建築等級上相對較低(因為座落於園林之中)。⁹⁸ 不論是從創建時間、名稱，還是大致的建築佈局來看，瑞應宮當為時應宮的「副本」或「翻版」。結合下文對於清世宗熱衷祈禱的討論，我們不難推論：對於清世宗而言，崇奉龍神之專祠乃是身邊必備的一種「設施」，因此他才在擴建圓明園的工程中，將其列為諸多建築項目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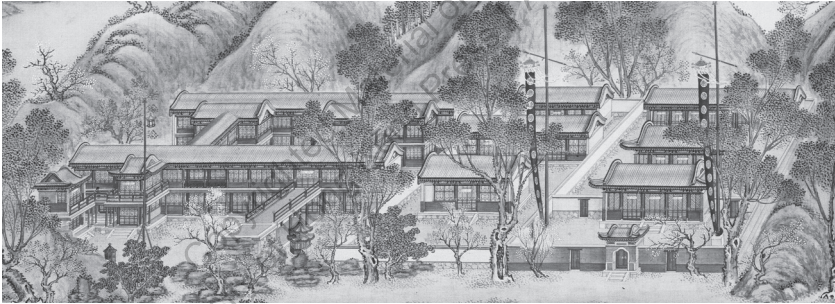


圖8 《圓明園四十景圖》之「日天琳宇」(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圖中右側幡杆高聳者即為瑞應宮

3. 祀源源流

時應宮中所奉祀的諸位龍神在此之前都未見於歷代祀典，從另一個角度說，通過構建這一龍神祀典，清世宗完成了一次對於龍神系統的全

⁹⁶ 其他六處供奉有龍神的祠廟為：「西峰秀色」龍王廟、「涵虛朗鑑」龍王廟、「舍衛城」龍王廟、「同樂園」龍王廟、「延英論道」龍王廟、綺春園祠神廟。參見賈珺：〈圓明三園中的祀廟祠宇建築探析〉，頁110-118。

⁹⁷ [清]于敏中：《日下舊聞考》，卷八一，第3冊，頁1355。

⁹⁸ 瑞應宮的建築規制參見賈珺：〈圓明三園中的祀廟祠宇建築探析〉，頁121-123。

面重整與創新。為了更好地了解他的意圖，我們有必要先稍加追溯龍神崇拜之淵源。

在《周易》中，龍便與水有了密切的聯繫，甚至居住於水中。⁹⁹《莊子》所描述的龍，不僅居於水中，還藏有寶珠。¹⁰⁰在《山海經》中，生有兩翼的「應龍」具有行雨的能力，¹⁰¹後世以龍為中心的雨神崇拜與祈雨儀式皆源於此。從春秋時代的《墨子》¹⁰²到漢代的《淮南子》、¹⁰³《遁甲開山圖》、¹⁰⁴《神農求雨書》¹⁰⁵均記載了以「土龍」求雨的儀式，¹⁰⁶其中董仲舒所作《春秋繁露》所記載之以五方五龍祈雨之法對後代影響最為深遠。¹⁰⁷至唐代，五龍的祠廟不僅已被廣為建立，且被列入國家祀典，於仲春祭之。¹⁰⁸山西芮城的五龍廟肇始於唐代，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

⁹⁹ 如在《周易》中，龍已經被描述為棲居水中之靈獸：「上經初九：潛龍，勿用。九四：或躍在淵，無咎。」[魏]王弼撰，樓宇烈校釋：《周易註》（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1。

¹⁰⁰ 「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陳鼓應註譯：《莊子今註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3），下冊，頁848。

¹⁰¹ 「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誇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早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註：今之土龍本此。」參見馬昌儀：《古本山海經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頁551-552。

¹⁰² 「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清]孫詒讓著，孫啟治點校：《墨子閒詁》，卷十二（北京：中華書局，2001），下冊，頁448。

¹⁰³ 「土龍致雨。註：湯遭旱，作土龍以像龍，雲從龍，故致雨也。」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上冊，頁342-343。

¹⁰⁴ 「《遁甲開山圖》：絳北有陽石山，有神龍池。黃帝時遣雲陽先生養於此，帝王歷代養龍之處，國有水旱不時，即祀池請雨。」[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卷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冊，頁257。

¹⁰⁵ 「《神農求雨書》：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為青龍，又為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為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雨，命為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為白龍，又為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為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唐]黃子發：《相雨書》（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11。

¹⁰⁶ 關於以龍為媒介的祈雨儀式，參見樊恭烜：〈祀龍祈雨考〉，《二十世紀中國民俗學經典：信仰民俗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114-121；杜文玉、王顏：〈中印文明與龍王信仰〉，《文史哲》，第6期（2009），頁124-133。

¹⁰⁷ 「凡求雨，甲乙日為大蒼龍一、小蒼龍七……丙丁日製大赤龍一、小赤龍六……戊己日製大黃龍一、小黃龍四……庚辛日製大白龍一、小白龍八。」[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88-90。

¹⁰⁸ 「仲春祭五龍，籩豆皆八、簋一、簠一、俎一。」[宋]歐陽修：《新唐書》，卷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75），第2冊，頁331。

木結構建築之一，¹⁰⁹ 湖北武當山五龍宮的前身即五龍廟，並有著唐代祈雨靈應的傳說。¹¹⁰ 至北宋大觀二年（1108），宋徽宗（1082–1135）又將天下五龍封以王爵。¹¹¹ 除了行雲佈雨的龍神之外，至遲到唐代，人們開始普遍認為水池、水井一類的自然水體中，往往有龍神主之。¹¹² 因此，更多具有靈性的池沼被稱之為龍池，¹¹³ 人們認為有龍居住在那裡，並臨水建立祠廟崇祀。¹¹⁴ 在此之後，主水龍神與行雨五龍的神格融合，¹¹⁵ 逐漸形成了近世以來對於龍神主水的共識。

自六朝以來，佛經中的蛇王那伽（nāgarājan）被有意地誤譯為龍王，¹¹⁶ 這對龍神信仰的促進與定型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¹¹⁷ 但不論是龍能行雨的神格，還是設立壇廟以及歲時饗祭的儀式，都是源自先秦以來的本土宗教傳統。¹¹⁸

¹⁰⁹ 丁焄：〈何種古跡觀：兼述9–10世紀的建築、景觀與文學〉，《建築學報》，第8期（2016），頁27–31。

¹¹⁰ 張華、鄭勇華：〈武當山五龍宮起源雜談〉，《漢江師範學院學報》，第2期（2014），頁1–3。

¹¹¹ 「京城東春明坊五龍祠，太祖建隆三年自元武門徙於此。國朝緣唐祭五龍之制，春秋常行其祀。先是熙寧十八年八月信州有五龍廟，禱雨有應，賜額曰『會應』。自是五龍廟皆以此名額云。徽宗大觀二年十月，詔天下五龍神皆封王爵，青龍神封廣仁王，赤龍神封嘉澤王，黃龍神封孚應王，白龍神封義濟王，黑龍神封靈濟王。」《宋會要輯稿·禮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2冊，頁562。

¹¹² 「聞汴州八角井多有龍神……此井乃龍神所處水府冥司。……」[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二二二（北京：中華書局，1961），第5冊，頁1779。

¹¹³ 一部分龍池是因為其中的水生四腳蛇（石龍子）而得名，如茅山三峰頂、元符宮之「龍池」以及「黎龍池」。¹¹⁴ [元]劉大彬編，[明]江永年增補，王崗點校：《茅山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頁154、271、365–366。

¹¹⁴ 「元宗開元二年，詔祠龍池。右拾遺蔡孚獻《龍池篇》，公卿以下一百三十篇，詔太常寺考其詞合音律者，為《龍池》樂章十首，又詔置壇及祠堂，每仲春將祭則奏之。十八年，有龍見於興慶池，因祀而見也。」[宋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九十（北京：中華書局，2011），第4冊，頁2766。

¹¹⁵ 「然而續有大小。事有分限。推而貫之。則浚川流河。與口渠降雨。為一指也。」張鑄：〈廣仁寺龍泉記〉，收入於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卷六十（北京：中華書局，2005），中冊，頁733。

¹¹⁶ Andreas Berndt, “The Cult of the Longwang: Their Origin, Spread, and Regional Significance,” 61–94.

¹¹⁷ 張培鋒：〈中國龍王信仰與佛教關係研究〉，《文學與文化》，第3期（2012），頁4–11；杜文玉、王顏：〈中印文明與龍王信仰〉，頁124–133。

¹¹⁸ 類似論點，參見閔祥鵬：〈五方龍王與四海龍王的源流〉，《民俗研究》，第3期（2008），頁200–205；杜文玉、王顏：〈中印文明與龍王信仰〉，頁124–127。

在諸多的龍神之中，以四海龍神的影響力最大。四海之神最早可見於《山海經》中之禺虢、不廷胡余、弇茲、禺強。¹¹⁹ 秦在雍時所祀之神，便已包含四海，¹²⁰ 在經過漢代、六朝的變化之後，¹²¹ 其祀典最終在唐代《開元禮》中確立下來。¹²² 天寶十年(751)，四海之神被封以王爵，¹²³ 位同五嶽之神，有學者將此誤以為勅封四海龍王，非也。此外，在國家正式的郊祀中，四海之神從未以龍王的神格出現過，雖然「四海龍王」的說法最早已在六朝道教的《洞淵神咒經》中出現，¹²⁴ 但直到明代，受傳奇、小說的影響才開始在信仰層面上普及。¹²⁵ 雍正二年，四海龍神祀典的最終確立則由清世宗完成：「雍正二年勅封四海龍神，東曰顯仁、南曰昭明、西曰正恒、北曰崇禮，均遣官齋祭文香帛，交該地方官致祭。」¹²⁶

《禮記》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¹²⁷ 四瀆的祀典實際定型於西漢宣帝神爵元年(前61)，並於地方建立專祠。¹²⁸ 自此以後，四瀆之神與五嶽形成了穩定的五嶽四瀆祭祀系統。¹²⁹ 天寶六年，唐玄宗(685-762)封河瀆為靈源公，濟瀆為清源公，江瀆為廣源公，淮瀆為長源公，¹³⁰ 位於五嶽、四海王爵之下。在國家祭祀的層面，四瀆之神與四海一樣，從未以龍神的位格出現。雍正二年，清世宗在勅封四海的同時，「賜號江瀆曰『涵和』，河瀆曰『潤毓』，淮瀆曰『通佑』，濟

¹¹⁹ 分辨見於《山海經》之《大荒東經》、《大荒南經》、《大荒西經》、《大荒北經》，參見馬昌儀：《古本山海經圖說》，頁546、565、583、607。

¹²⁰ [漢]司馬遷：《史記》，卷二八(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4冊，頁1375。

¹²¹ 參見牛敬飛：《論先秦以來官方祭祀中的海與四海》，《宗教學研究》，第3期(2016)，頁245-249。

¹²² [唐]蕭嵩等：《大唐開元禮》，卷一，《四庫全書》，第646冊，頁44。

¹²³ [五代]劉昫：《舊唐書》，卷二四(北京：中華書局，1975)，第3冊，頁934。

¹²⁴ 《太上洞淵神咒經》，卷十三，《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第6冊，頁47-50。

¹²⁵ 孫遜：《四海龍王考論》(上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頁30-39。

¹²⁶ [清]昆岡等：《(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四四三(光緒二十五年刻本)，頁五下至頁六上。

¹²⁷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卷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9)，上冊，頁347。

¹²⁸ [漢]班固：《漢書》，卷二五(北京：中華書局，1965)，第4冊，頁1249。

¹²⁹ 田天：《秦漢國家祭祀史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頁317。

¹³⁰ [五代]劉昫：《舊唐書》，卷二四，第3冊，頁934。

瀆曰『永惠』。¹³¹ 在《清史稿》中，這段記錄與四海龍神的封號並列，當亦是龍神之封號。

時應宮正殿正中所供奉的「順天佑畿龍神」即京畿地區龍神，與兩旁十七省龍神均未見於歷代祀典，皆為清世宗所新封立者。晚清文人陳作霖將時應宮內的京畿龍神呼作「天下都龍王」，¹³² 這種配置應是直接參照了北京都城隍廟以明代十三省城隍配立兩側的規制。¹³³ 清世宗對明太祖（1328–1398）所創立的以都城隍為中心的城隍神系統十分熟悉，他不但曾重修都城隍廟並御製碑文，¹³⁴ 還於紫禁城內西北以及皇城內西北隅創立了宮城及皇城的城隍廟。¹³⁵

然而清代中國疆域不止十七直省，一史館所藏清世宗御製龍神造像圖樣不僅包含了京畿及十七直省龍神，還包含有關外的奉天龍神，以及熱河行宮的福邊龍神（見下文）。也就是說，清世宗不僅效仿了朱元璋的城隍神學，更將其進一步推進，與清代版圖相應，由此真正形成了由龍神系統所體現之國家。

雍正五年，清世宗增建時應宮後殿，供奉八方龍神。目前已很難考證此八方龍神的確切名號以及神格，但如將主殿所供奉的天下都龍王視作中央龍神，與八方龍神相組合，共成九龍，也就形成了一個由龍神所組成的九宮格宇宙範式。源自「井」字的九宮圖，其含義自漢代

¹³¹ [民國]趙爾巽等：《清史稿》，卷八三，第10冊，頁2511。

¹³² [清]陳作霖：《可園文存》，卷九，《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36冊，頁七五上。「都龍王」之稱明代即已有之，但指京西北昌平白浮泉之龍神。元代郭守敬疏浚大都水利，引白浮諸泉之水經翁山泊（今頤和園之昆明湖）注入積水潭、太液池，並經通惠河至通州，注入大運河，由此白浮泉成為大都內的重要水源，以及大運河最北端之水源。明代由於白浮泉位於天壽山皇陵區域，出於風水考慮不再引白浮泉水源入京，其地位漸失。明、清兩代官方都未將白浮泉龍神祠廟列入祀典，但其龍神至清代仍被當地百姓稱之為「都龍王」。參見張劍葳：〈白浮泉、都龍王廟與龍泉寺〉，頁623–625；朱穎：〈大運河北京段（元）通惠河與白浮「源」的認知〉，《建築創作》，第5期（2017），頁50。

¹³³ 北京都城隍廟儀門下兩旁塑有天下十三省城隍立像（實為十二，因為明代以江南省為陪都），參見：[清]于敏中：《日下舊聞考》，卷五十，第2冊，頁795–796。

¹³⁴ 同上註，頁796。

¹³⁵ [英華殿之西北有城隍廟，雍正四年建，其祀典亦掌儀所司也。][清]鄂爾泰：《國朝宮史》，頁263。「永佑廟祀城隍神（城冊）。[臣等謹按]永佑廟，雍正九年建，正殿恭懸世宗御書額曰『順承協德』。][清]于敏中：《日下舊聞考》，卷四二，第2冊，頁665。

以來逐漸被豐富，成為一套涵納八卦、五行的宇宙論圖示範式，並用以解釋天子所居「明堂」與天下九州之關係。¹³⁶ 漢儒班固、鄭玄、應劭皆認為明堂「九室法九州」。¹³⁷ 按《逸周書》所云：「周室既甯，八方會同」，¹³⁸「會方國諸侯於宗周」，¹³⁹ 在這場被稱之為「成周之會」的歷史性儀式中，周王居於明堂之上，四周環立各方國諸侯以及蠻夷代表。¹⁴⁰ 由此，「八方」一方面意指中央以外的各個方國（九州王土），也泛指化外蠻夷之所。八方龍神因此也具有天子一統天下，懷柔萬邦的含義。

4. 祈禱活動

根據文獻來看，時應宮內的宗教活動大抵分為五種。第一種即列入祀典的祭祀，「每歲以六月十三日致祭，用素饘香燭，遣內務府官行禮」。¹⁴¹ 以此來看，時應宮的龍神似乎已經不再需要享用血食，而更傾向於「道釋化」。¹⁴² 按檔案所見，每逢龍神聖誕前，內務府官員都會專門向皇帝呈摺，恭請委派「散秩大臣」臨壇拈香。¹⁴³

第二種是在亢旱時節所做的應時禱雨祭祀，《大清會典》中詳細記載了儀註並規定了得雨之後「報祀」的規格。¹⁴⁴ 以上兩種宗教活動是按照傳統的祭祀形式來舉行的，因為按照祀典，它們屬於群祀，皆為

¹³⁶ 王其亨：〈「井」的意義——中國傳統建築的平面構成原型及文化淵涵探析〉，收入於氏著：《中國建築史論選集》（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2014），頁90—116。

¹³⁷ [漢]班固：《白虎通義》，卷二，《關中叢書》（西安：陝西通志館，1934），頁二一。

¹³⁸ 《逸周書》序，《四庫全書》，第370冊，頁4下。

¹³⁹ 《逸周書》，卷六，《四庫全書》，第370冊，頁48上。

¹⁴⁰ 同上註。

¹⁴¹ [清]《欽定皇朝通典》，卷四二，《四庫全書》，第642冊，頁509下。

¹⁴² 所謂「道釋化」即遵依道教科律或佛教儀軌，以素饌代替原有祭祀宗教中以血食奉獻神明的儀式行為傳統；相應地，儀式中也增入了誦經等道、釋共享的儀式內容。[清]李維鈞：〈雍正三年五月初一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十下，《四庫全書》，第416冊，頁582上。

¹⁴³ 例如光緒十五年（1889）六月初八日，內務府呈遞了三名「散秩大臣」的名單：公慶麟、公啟泰、固倫額駙品級阿克東阿，清德宗在名單中朱圈第一位，委派前往六月十三日時應宮龍神聖誕道場拈香。[清]總管內務府：《奏請於名單內欽派一員前往龍神聖誕時應宮道場行禮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內務府奏銷檔，奏銷檔822-039（光緒十五年）。

¹⁴⁴ 有趣的是，根據規定，得雨後的報祀需用「一羊、一豕」，與之前的素饘祭祀相互矛盾。《欽定大清會典》，卷八八，《四庫全書》，第619冊，頁816上。

內務府遣官致祭。按照清宮檔案記載，每逢祈雨，皇帝都會委派「散秩大臣」臨壇拈香（有時則由皇帝親禱，見下文），¹⁴⁵ 這與後來的宣仁廟、凝和廟及昭顯廟一同構成了清代中晚期固定的祈雨廟宇組群（見下文）。

第三種則為節慶時的道門誦經道場。時應宮雖然是專奉龍神的祠廟，並列入群祀的祀典，但其廟內的宗教活動也包括一系列按照道門科儀舉行的道場，其自創建伊始便專門「設住持道士，以供香火」。¹⁴⁶ 高萬桑 (Vincent Goossaert) 在他的 *The Taoists of Peking, 1800–1949* (《北京的道士》) 一書中指出，京師內外共有包括時應宮在內的 11 座祠廟由道教正一派的法官住持。¹⁴⁷ 這便使得時應宮如同朝陽門外東嶽廟、地安門外火神廟一樣，成為了一座專為國家、皇室祈禱的宮觀。按《大清會典則例》載：「時應宮……設住持道士以供香火，每年六月十三日，新正前後九日，萬壽聖節前後三日，皆啟建道場。」¹⁴⁸ 按清宮檔案所見，每逢新禧¹⁴⁹ 或萬壽節¹⁵⁰ 前，內務府官員都會按例向皇帝呈摺，恭請委派「散秩大臣」臨壇拈香。

¹⁴⁵ 目前所能見到最早的委派大臣前往時應宮祈雨拈香的檔案為雍正十年二月十七日由和碩莊親王允祿所呈進的滿文奏摺。[清]允祿：《奏報本月十六日時應宮祈雨道場圓滿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內務府奏銷檔，奏銷檔 180-014-1 (雍正十年)。

¹⁴⁶ [清]昆岡等：《(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一八六 (光緒二十五年刻本)，頁十一下。

¹⁴⁷ 高萬桑曾在其書中第五章“Taoists and the Court: Chaplains and Eunuchs”集中討論了明清以來宮廷道教的體制變遷及主要人員構成，節日道場種類，以及管理體制。Vincent Goossaert, *The Taoists of Peking, 1800–1949: A Social History of Urban Cler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188–273.

¹⁴⁸ [清]昆岡等：《(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一八六 (光緒二十五年刻本)，頁十一下至頁十二上。

¹⁴⁹ 新年道場由前年臘月二十七日開始，直至當年正月初五日結束，期間除了焚香獻果外，還要焚化元寶、千張和紙紮，是典型的道教道場。關於委派大臣事例可參見[清]總管內務府：《奏請於名單內欽派一員前往時應宮道場行禮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內務府奏銷檔，奏銷檔 824-177 (光緒十五年)。關於道場應用什物及經費開銷，參見[清]總管內務府：《內務府呈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內務府檔案，05-08-003-000113-0020 (道光五年)。

¹⁵⁰ 可參見[清]總管內務府：《奏請簡派散秩大臣以萬壽誕辰禮於時應宮等處行禮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內務府奏銷檔，奏銷檔 461-195 (嘉慶十八年)。還可參見[清]總管內務府：《奏為萬壽聖節派散秩大臣於時應宮等處辦道場事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內務府奏銷檔，奏銷檔 519-070 (道光三年)。

第四種為皇帝日常生活中的拈香，這不屬於任何形式的祈禱儀式，而是時應宮作為宮廷祠廟，已經成為皇帝日常宗教生活中的有機部分之一。在清世宗之後諸帝的《起居註》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皇帝駕臨時應宮拈香的記載。¹⁵¹

第五種，也是最為重要的一種，即皇帝私人性質的親臨祈雨。雍正二年六月，京師連雨，清世宗「步行往禱，其日即晴」。清高宗御製《時應宮記》¹⁵² 以及皇子弘晝所作《甲辰六月連雨皇父親詣時應宮禱晴恭記》¹⁵³ 都記錄了此事。除皇帝外，皇太后有時也會進行此類活動。乾隆九年，孝聖憲皇后曾因「天時亢旱」，先後兩次步行至龍神廟祈禱。¹⁵⁴ 步行前往壇所祈禱的做法不是清朝才有，明萬曆十五年（1587），年輕的明神宗皇帝便步行至天壇祈雨，¹⁵⁵ 這些帶有自我懲罰意味的帝王親禱，不僅是宗教學意義上的典型範例，更可以上溯至商湯禱於桑林之下的傳說。¹⁵⁶ 由於具有私人性質，所以時應宮內的親禱並不嚴格按照傳統祭禮的模式來舉行。雍正三年三月，清世宗告訴河南巡撫田文鏡：「朕於二十六日親詣時應宮，專為河南祈禱。」¹⁵⁷ 兩個月後，他在給直隸總督李維鈞（?-1727）奏摺的硃批上表示，「朕即位以來，凡有祈禱，從未命僧道之流設壇作法，只令其諷誦經典，代達一疏文而已」。¹⁵⁸ 由此可知，至少在雍正朝，時應宮內的皇帝親禱往往還與道眾的誦經道場相結合。

清世宗雖然重視宗教儀式中的文字表達（如疏文），但他更認為，身為「人天媒介」的他，親自祈禱更具有效果。如前文所述，世宗曾屢

¹⁵¹ 類似的事例參見《仁宗睿皇帝實錄》卷十六，《清實錄》，第28冊，頁223上。

¹⁵² [清]鄂爾泰：《國朝宮史》，頁339-340。

¹⁵³ [清]弘晝：《稽古齋全集》，卷四（清乾隆十一年內府刻本，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頁二三下。

¹⁵⁴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二一六，《清實錄》，第11冊，頁774下。

¹⁵⁵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頁125。

¹⁵⁶ 《呂氏春秋·順民篇》：「昔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磨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許維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卷九，上冊，頁200。

¹⁵⁷ [清]田文鏡：《雍正三年四月十三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一二六之四，《四庫全書》，第421冊，頁104下。

¹⁵⁸ [清]李維鈞：《雍正三年五月初一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十下，《四庫全書》，第416冊，頁582上。

屢提及他為地方水旱親禱，有理由相信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在時應宮中舉行的。至於圓明園瑞應宮的祈禱活動，所見記錄不多。但自清世宗以來，圓明園一直是清代帝王重要的離宮，一年之中有相當長的時間，清帝都在這裡度過。因此，作為時應宮的副本或翻版，瑞應宮應是清世宗在離宮內親禱雨暘的壇所。同時，瑞應宮與時應宮一樣，由內務府所轄道士住持。¹⁵⁹

需要注意的是，清世宗非常擔心大臣認為他依賴於祈禱，更不喜歡有人進行一些明顯投其所好的舉動。雍正二年，直隸總督李維鈞上書世宗，吹噓自己通過祭祀劉猛將軍抵禦蝗災，這份奏摺獲得重視，劉猛將這一來自江南民間的「淫祀」竟一躍躋身禮部祭祀序列。¹⁶⁰然而雍正三年秋，兩江總督查弼納(1683-1731)上書報告劉猛將祭祀靈驗，敏感的世宗認為，這位地方大員誤認為他「專恃祝禱為消弭災祲之方」。他向大學士們解釋，當年答應李維鈞推廣劉猛將祭祀，只是因為其或許「有益於民生」。自己聽聞地方水旱時，首先做的是「恐懼修省」和「朝乾夕惕」，而在宮中祈禱鬼神的行為「不過藉以達誠心耳」。¹⁶¹

(b) 零禮層面：風雲雷雨神祠

1. 宣仁廟(風伯神祠)

(i) 創立始末

宣仁廟是清世宗所建，專門崇奉風神的專祠。「風」作為自然界常見的自然現象，往往與降雨相伴，其在達到一定的強度後，往往成為其他自然災害的誘因或重要組成部分，如：伴隨降水的颱風以及沿海海水氾濫。在清中期的河南黃河兩岸，強風、降水往往與河水作用在一起，衝擊並瓦解堤壩，並造成決口。如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黃河河面上北風大作，將南岸中牟縣楊橋官堤衝開，¹⁶²又如雍正三年七月

¹⁵⁹ 「圓明園內各殿座一年用柴炭分例：佛樓……法官二名、道士五名。」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代檔案史料——圓明園》，頁85-86。

¹⁶⁰ 龔光明、陳玲玲：〈皖北劉猛將軍廟研究〉，《宗教學研究》，第4期(2012)，頁268-272。

¹⁶¹ 〈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三十四，《清實錄》，第7冊，頁516上。

¹⁶² [清]稽曾筠：〈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一七五之一，《四庫全書》，第423冊，頁476下。

十三日，狂風驟雨將北岸蘭陽縣板廠（今屬河南蘭考）大堤衝開，缺口長達十二丈。¹⁶³ 據河南巡撫田文鏡分析，風雨之所以容易對黃河大堤造成致命威脅，「蓋因豫省土性鬆散，略被風雨吹刷，兩岸所挑沙土即歸河道」。¹⁶⁴ 在沿海地區，由颶風所引起的巨潮往往出現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區，由此所帶來的損失更為重大。如雍正二年七月十九日，東海海面颶風引起海嘯，北起黃河入海口（今江蘇鹽城濱海縣境內），南至錢塘江入海口，皆被巨浪所襲擊。其中僅松江一府所屬華亭縣、金山衛，上海縣所屬川沙、南匯等處土堤海塘，被海浪衝開者，就多達五十五處，長達四千餘丈。¹⁶⁵ 針對強風所造成的河堤損害，山東、河南兩省的河臣與工匠發明了「防風護埽」，以抵禦風浪對土堤的沖刷，而在沿海地區，則有仿照浙江海塘，建造魚鱗石塘的設想。¹⁶⁶

在如此的災害背景下，清世宗逐漸意識到應當參照龍神的祀典，設立風神專祠。雍正六年二月初六日，他向內閣頒佈上諭：「朕惟風雨時若，百物繁昌，皆由誠敬，感格天心，用能福佑下民，時和稔。而司天號令，長養阜成，風神之貺，厥功允懋。頻年以來，朕虔祀龍神，福庇蒼生，歷有明驗。因思古稱雨暘燠寒，以風為本，亦宜特隆祀典，以答洪庥……。今欲於都城和會之地，特建廟宇，因時禱祀，以展朕為民祈福之誠。其考據禮儀，相度營建之處，著禮、工二部會同內務府詳議具奏。」¹⁶⁷ 群臣議奏：「謹按風歸為箕星。經傳考據，曆有明文。箕星係蒼龍之第七宿，位在東北，致祭方向，自宜就其星位。謹擇都城東北官房一所，建立廟宇。」¹⁶⁸ 清世宗從議，並賜額曰：「宣仁廟」。¹⁶⁹ 今日所見的宣仁廟座落在紫禁城東北隅之北池子大街北口，可知清世宗選擇了宮城東北域，而非都城之東北隅，這一

¹⁶³ [清]田文鏡：〈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一二六之五，《四庫全書》，第421冊，頁145下。

¹⁶⁴ [清]田文鏡：〈雍正三年六月初十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一二六之四，《四庫全書》，第421冊，頁130下。

¹⁶⁵ [清]鄂爾泰：〈雍正二年九月初四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一二五之一，《四庫全書》，第420冊，頁248上。

¹⁶⁶ 同上註，頁249上。

¹⁶⁷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六十六，《四庫全書》，第415冊，頁11下。

¹⁶⁸ 《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七一，《清實錄》，第7冊，頁1006。

¹⁶⁹ [清]昆岡等：《（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一八六（光緒二十五年刻本），頁十三上。

位置恰恰與位於金鰲玉蝀橋西的時應宮位於同一緯度之上，遙遙相對（參見圖9）。

(ii) 建築規制

經群臣議奏，宣仁廟的建築形制「仿時應宮式營建」。¹⁷⁰ 從目前現存的格局來看，宣仁廟所佔基地比時應宮略狹，建築基本參照時應宮：坐北朝南，山門、前中後三殿皆為單簷歇山式建築，並設鐘鼓樓，皆為黃琉璃瓦綠剪邊。其中山門上鑲嵌有「勅建宣仁廟」石額，主殿供奉「應時顯佑風伯之神」，後殿供奉「八風之神」。唯一與時應宮不同的是，山門前增設琉璃影壁一座，並於臨街之西側設拱券門。¹⁷¹ 在後來所形成的風雲雷雨四廟系統中，宣仁廟是目前建築保存最為完整的一座，1984年公佈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並於2004年得到了系統性的修繕。

2. 凝和廟（雲師神祠）、昭顯廟（雷師神祠）

(i) 創立始末

凝和廟、昭顯廟是清世宗所建，分別專祀雲神、雷神。就在勅建風神廟後的一年，清世宗又上諭內閣：「朕惟雲雨風雷之神，代天司令，俾百昌萬寶，普含膏澤，以錫福於烝民，厥功並懋。朕恭承天眷，恪修祀典，為四海蒼黎，仰祈嘉佑，已經特建廟宇，崇祀龍神、風伯，而雲師、雷師尚闕專祠……。今欲特建廟宇，虔奉雲師、雷師之神，因時禱祀，敬迓洪庥，以展朕為民祈福之意。其考據禮儀、相度營建之處，著禮、工二部詳議具奏。」¹⁷² 稍後群臣議奏：「遵旨議定：《明集禮》既稱雷雨在西、風雲在東。今雷師廟宇，應建於西方。雷師照古制，於立夏後申日致祭。惟雲師古無專祠日期，應依明會典合祭之期，每歲於秋分後三日致祭。其廟宇規制，悉仿宣仁廟式建造。其封

¹⁷⁰ [清]昆岡等：《（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一八六（光緒二十五年刻本），頁十三下。

¹⁷¹ 宣仁廟建築的具體信息參見北京市文物事業管理局：《北京名勝古跡辭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頁75。

¹⁷²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七十八，《四庫全書》，第415冊，頁194上。

號並廟名扁額字樣，交與內閣撰擬，進呈御覽，恭候欽定。」¹⁷³ 清世宗從議，賜雲師廟額曰：「凝和廟」，雷師廟額曰：「昭顯廟」。¹⁷⁴

(ii) 建築規制

凝和廟座落於北池子大街中段，宣仁廟之正南，昭顯廟則位於北長街中段，凝和廟正西。此三廟連同時應宮，共成「風雲雷雨四廟」（詳見下文），其皆以紫禁城為中心，時應宮為起始參照，依次遙遙相對，精心佈劃而成（參見圖9）。¹⁷⁵ 經群臣議奏，凝和廟與昭顯廟的建築規制「悉仿宣仁廟式建造」。根據目前兩廟的建築遺存來考察，其所佔基地之長寬與宣仁廟基本相等，且建築形制完全一致。由於此兩廟自民國以來便已改為學校，故而建築保存狀況不如宣仁廟完整。其中凝和廟現存有主體建築：山門、前中後三殿以及當街門樓；琉璃影壁、鐘鼓樓以及其他附屬建築均不存。昭顯廟則僅存中、後二殿。此二廟建築遺存現均已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圖9 風、雲、雷、雨四廟與紫禁城之位置關係（Google Earth，陶金標示）

¹⁷³ [清]昆岡等：《（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一八六（光緒二十五年刻本），頁十三下。

¹⁷⁴ 同上註，頁十五上。

¹⁷⁵ 關於風雲雷雨四廟的研究，參見傅育紅：〈清代皇城祈雨廟〉，《北京檔案史料》，第2期（2006），頁219-226。

3. 祀典源流

《周禮·天官》云：「大宗伯之職……以禋祀司中、司命、鬯師、雨師。」¹⁷⁶ 蓋風伯、雨師之崇祀早已行之，且常被列入雩禮的祭法之中。¹⁷⁷ 秦之雍時，亦有風伯、雨師之祠。¹⁷⁸ 至唐代又增雷神入祀典，與風、雨神並列。¹⁷⁹ 明初考訂禮儀，增入雲神，與其他三神從祀於南郊，又設立天神壇作為專祀的壇所，最終形成代表氣候的「風雲雷雨」四神。¹⁸⁰ 明代還規定：「王國、府、州、縣，亦祀風、雲、雷、雨師，仍築壇城西南。祭用驚蟄、秋分日。」¹⁸¹ 從此，風雲雷雨的祭祀成為全國上下一體的儀典。清代因襲明世宗(1507–1567)以來的祀典制度，風雲雷雨依然從祀南郊，並於天神壇上專祀，但就「雩禮」又作了進一步的修訂：廢棄明代的雩壇，改以圜丘作為壇所，風雲雷雨仍然作為從祀神列於圜丘之第二層。¹⁸² 雍正三年，清世宗將直省府州縣之「風雲雷雨壇」調整為「神祇壇」，即「設雲雨風雷位於中，設山川位於左，稱「某府州縣境內山川之神」，設城隍位於右，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¹⁸³ 可見，清世宗特別重視的山神、河神、風雲雷雨之神以及城隍神共躋一壇，春秋受饗。

¹⁷⁶ [漢]鄭玄註，[唐]賈公彥疏，彭林整理：《周禮註疏》，卷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中冊，頁646。

¹⁷⁷ 唐肅宗乾元二年(759)三月，「以久旱，徙東西二市，於是祭風伯、雨師，修雩祀壇，為泥人、土龍及望祭名山大川而祈雨。」[宋]王欽若：《冊府元龜》，卷一四四(北京：中華書局，1960)，第2冊，頁1752。

¹⁷⁸ [漢]司馬遷：《史記》，卷二八，第4冊，頁1375。

¹⁷⁹ 「若風師、雨師之祀，見於《周官》，後世皆有祭。唐天寶中，增雷師於雨師之次。宋、元因之。然唐制各以時別祭，失享祀本意。宜以太歲、風雲雷雨諸天神合為一壇，諸地祇為一壇，春秋專祀。」[清]張廷玉：《明史》，卷四九(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4冊，頁1282。

¹⁸⁰ [清]張廷玉：《明史》，卷四七，第4冊，頁1230；卷四九，第4冊，頁1280–1281。

¹⁸¹ 同上註，卷四九，第4冊，頁1283。

¹⁸² 「雩祀，關外未嘗行。順治十四年夏旱，世祖始禱雨圜丘。」[民國]趙爾巽等：《清史稿》，卷八三，第10冊，頁251；卷八二，第9冊，頁2459。

¹⁸³ [清]昆岡等：《(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四四〇(光緒二十五年刻本)，頁二三上。

雍正七年，清世宗將新勅建的凝和廟、昭顯廟與宣仁廟、時應宮（以龍神作為雨師）相並列，成為「風雲雷雨」四神的專祠，凡遇祈雨之時，則於四廟同時祭禱。¹⁸⁴

4. 祈禱活動

明清兩朝位於南郊的「天神壇」，是將日月星辰、風雲雷雨會於一壇同時祭祀的壇所。然而時應宮等風雲雷雨之專祠，其專門的祭祀時間則各不相同：時應宮於六月十三致祭，宣仁廟以立春後丑日致祭，昭顯廟以立夏後申日致祭，凝和廟以於秋分後三日致祭。¹⁸⁵ 與用犧牲的天神壇不同，此四廟「均素饘香燭，遣內府官行禮」。¹⁸⁶ 偶逢祈雨之時，四廟也共同舉行祭典。¹⁸⁷ 從清朝中晚期開始，風雲雷雨四廟與皇城內的大高玄殿成為宮廷祈雨的重要壇所，皇帝往往親詣大高玄殿拈香（有時連同時應宮），並派遣大臣詣其他諸廟拈香。¹⁸⁸ 以此來看，大高玄殿與風雲雷雨四廟不啻為具有道教化色彩的內廷版「小零禮」。¹⁸⁹ 與零禮相同，四廟均要在得雨之後舉行報祀之典。¹⁹⁰

¹⁸⁴ [清]昆岡等：《（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一八六（光緒二十五年刻本），頁十六下。

¹⁸⁵ 同上註。

¹⁸⁶ [清]允禵：《欽定大清會典》，卷八八，《四庫全書》，第619冊，頁815下。

¹⁸⁷ [清]昆岡等：《（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四二〇（光緒二十五年刻本），頁十一下。

¹⁸⁸ 參見[清]總管內務府：《為祈雨皇上親詣大高殿時應宮拈香並派惇郡王奕諒等詣宣仁廟凝和廟等處拈香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內務府檔案，05-13-002-000192-0090（咸豐二年）；[清]奏事處：《皇上詣大高殿拈香並時應宮等處遣恭親王等拈香清單》，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05-13-002-000223-0187（同治三年）。

¹⁸⁹ 以大高玄殿及時應宮等廟可能是清宮祈雨的基本壇所，但祈雨壇廟的名單有時會被擴展至13處：大高玄殿、時應宮、天神壇、地祇壇、太歲壇、覺生寺、黑龍潭、昭顯廟、宣仁廟、凝和廟、清漪園龍神祠、靜明園龍神祠、白龍潭。參見[清]奏事處：《皇上詣大高殿時應宮拈香並天神壇等處遣惇親王等拈香清單》，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05-13-002-000253-0149（光緒二年）。

¹⁹⁰ 《欽定大清會典》，卷八八，《四庫全書》，第619冊，頁816上。

(c) 地方層面

1. 直、省龍神祠廟

(i) 創立始末

直、省龍神祠廟，是清世宗通過將時應宮內的直隸、各省龍神像派送地方奉祀，從而形成的龍神祠廟系統。雍正五年七月，還沉浸在黃河澄清的喜悅中的清世宗上諭內閣：「龍神散佈霖雨，福國佑民，功用顯著。朕在京虔設各省龍神像位，為各省祈禱。今思龍神專司各省雨澤，地方守土大臣理應虔誠供奉。朕特造各省龍神大小二像，著該省督撫迎請，供奉本地，誠展祀。」與此對應的是《大清會典事例》關於時應宮的記錄：「五年，移直省龍神位奉於各省。」可知時應宮內的直省龍神像被配以一稍小的副本，被送至各省，關外以及邊外，我們在此暫將這些龍神稱為「省龍神」。¹⁹¹

各省龍神像大約於當年十月製作完畢，並運往各省。但由於各省路途及條件不一，神祠之建築並不完全一致，但大都於當年開工建設。就各地志書所見，省龍神祠廟的選址放棄了傳統意義上的臨水空間，¹⁹² 而大都建立在巡撫衙門附近以利督撫應時祈禱。甚至在一些縣裡，也建立了省龍神祠廟。¹⁹³

(ii) 建築規制及祀典源流

各省省龍神祠廟多建於督撫治所附近，也許是近代以來衝擊的原因，幾乎無有遺存者；故而本文暫略其建築規制。至於祀典源流，則可參見時應宮一節。現僅就各省地方志所見省龍神祠廟，列舉部分信息如下。

¹⁹¹ 實際上，清世宗所言「各省」不僅僅是全國十七省，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時應宮各省龍神造像圖樣中便包含了關外的奉天龍神，以及邊外龍神。

¹⁹² [清]黃維翰：《（道光）鉅野縣志》，卷八，《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83冊，頁139上。

¹⁹³ 如山東省之歷城縣、巨野縣、陵縣，江南省江蘇之太倉州，安徽之甯國府、旌德縣、東流縣，貴州省之息烽縣、松桃廳，江西省之瑞州府、吉安府、建昌府，廣東省之海陽縣，湖南省之新化縣，山西省之霍州府，湖北省之江夏縣，都在省城之外建有省龍神廟。

省份	勅封神號	省城廟址	創建時間
直隸	順天佑畿時應龍神	保定府迎熏門外	乾隆十二年開浚府河，建廟立像 ¹⁹⁴
奉天	護都豐農龍神	撫近門內	雍正六年建修 ¹⁹⁵
山東	福齊惠應龍神	濟南府院署西	雍正五年，奉旨頒送神像於省城，設祠崇祀 ¹⁹⁶
山西	福晉宣澤龍神	太原府巡撫署東	雍正五年奉勅建造 ¹⁹⁷
河南	闕考	開封府府治西南	雍正五年奉旨京師裝塑神像，各省遣官迎請崇祀 ¹⁹⁸
陝西	福秦順應龍神	西安府府治西南	雍正五年七月，內奉上諭，迎請「福秦順應龍神」大小二像，立廟宇供奉 ¹⁹⁹
湖南	福湘安農龍神	長沙府府治東北	雍正九年建 ²⁰⁰
湖北	闕考	武昌府撫署東	建於雍正之時，而乾隆時則加修耳 ²⁰¹
江南	福吳富農龍神	江甯府錢廠橋	雍正五年遵建 ²⁰²
江西	福贛甘澤龍神	南昌府府治中大街	雍正五年奉旨建 ²⁰³
浙江	福越滋農龍神	杭州府吳山大觀台下	雍正五年，上遣官齎送龍神像於浙，勅封福越滋農龍神，巡撫臣李衛擇地創建 ²⁰⁴

¹⁹⁴ [清]《(光緒)保定府志》，卷三，《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第30冊，頁505上。

¹⁹⁵ [清]程世榮等：《重修龍王廟碑》，瀋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瀋陽碑志》(瀋陽：遼海出版社，2011)，頁272。

¹⁹⁶ [清]王贈芳：《(道光)濟南府志》，卷十八，《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第1冊，頁386上。

¹⁹⁷ [清]儲大文：《(雍正)山西通志》，卷一六四，《中國地方志集成·省志輯·山西》(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第6冊，頁407下。

¹⁹⁸ [清]田文鏡：《(雍正)河南通志》，卷四八，《四庫全書》，第537冊，頁3上。

¹⁹⁹ [清]舒其紳：《(乾隆)西安府志》，卷六二，《中國地方志集成·陝西府縣志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第2冊，頁89上。

²⁰⁰ [清]李瀚章：《(光緒)湖南通志》，卷七四(清光緒十一年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頁二上。

²⁰¹ [清]呂調元：《(民國)湖北通志》，卷二七(民國十年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頁二下。

²⁰² [清]尹繼善：《(乾隆)江南通志》，卷三七，《中國地方志集成·省志輯·江南》(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第3冊，頁706上。

²⁰³ [清]謝旻：《(雍正)江西通志》，卷一〇八，《四庫全書》，第516冊，頁566上。

²⁰⁴ [清]李衛：《(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一七，《中國地方志集成·省志輯·浙江》(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第7冊，頁511上。

省份	勅封神號	省城廟址	創建時間
福建	闕考	福州府郡城九仙山上	雍正五年奉旨建 ²⁰⁵
廣東	福粵善應龍神	廣州府巡撫署東	雍正三年建，五年奉旨，韶州府通判陸柱國赴京，恭迎到粵奉祀 ²⁰⁶
廣西	闕考	桂林府譙樓北	雍正五年欽奉上諭，迎請龍神大小二像，委桂林府通判張允臨監造 ²⁰⁷
四川	闕考	成都府東門內	雍正六年建 ²⁰⁸
雲南	福滇益農龍神	雲南府西門內	雍正六年奉旨勅封福滇益農龍王，內府造像，輦送至滇建祠 ²⁰⁹
貴州	福黔潤澤龍神	貴陽府內北隅龍井	雍正五年奉旨建 ²¹⁰
邊外	邊外福疆廣應龍王	熱河行宮「暖流暄波」及如意洲法林寺內	雍正五年

(iii) 祈禱活動

通過比對各省志書中有關省龍神祠廟的資料，可知其在清世宗時期並未遵循統一的儀註，通行的省龍神祭文要等到乾隆八年才由禮部所頒行。²¹¹ 至於致祭的日期，早期亦並無定例，以春分、秋分前後辰日致祭的統一日期也要到乾隆三十四年才頒定。²¹² 此外，每月的朔望兩日由督撫行香，也成為各省龍神祠廟的通例。²¹³

²⁰⁵ [清]郝玉麟：《（乾隆）福建通志》，卷十五，《四庫全書》，第527冊，頁580下。

²⁰⁶ [清]阮元：《（道光）廣東通志》，卷一四五（清道光二年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頁二下。

²⁰⁷ [清]金鉞：《（雍正）廣西通志》，卷四二，《四庫全書》，第566冊，頁213上。

²⁰⁸ [清]黃廷桂：《（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八，《四庫全書》，第560冊，頁527上。

²⁰⁹ [清]鄂爾泰：《（乾隆）雲南通志》，卷十五，《四庫全書》，第569冊，頁435上。

²¹⁰ [清]鄂爾泰：《（乾隆）貴州通志》，卷十，《四庫全書》，第571冊，頁230上。

²¹¹ [清]黃維翰：《（道光）野縣志》，卷八，《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第83冊，頁139上。

²¹² [清]李瀚章：《（光緒）湖南通志》，卷七二（清光緒十一年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頁二四上。

²¹³ [清]王贈芳：《（道光）濟南府志》，卷十八，《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第1冊，頁386上。[清]李福泰：《（同治）番禺縣志》，卷十七，《中國地方志集成·廣東府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第6冊，頁187上。[清]盧蔚猷：《（光緒）海陽縣志》，卷二十，《中國地方志集成·廣東府縣志輯》，第26冊，頁562下。

除了定期的祭祀與行香外，在特定的針對雨暘的祈禱中，各省龍神廟成為了西苑時應宮在地方上的投影，督撫也在祈禱方式上對清世宗進行仿效：「巡撫……凡有祈求雨澤，熏壇步禱，甘澍立沛，靈應如響。」²¹⁴ 此外，其祈禱儀式也與時應宮十分相似，即以僧道誦經道場的形式拜呈疏文，得雨之後再行報祀：「凡遇禱雨，齋戒，禁止屠宰……僧道各一班，開壇誦經。禮生四名，鼓吹一班。各官衣素服，步行至廟，禮生引至拜位，讚，行二跪六叩頭禮。宣疏文，畢，再行二跪六叩頭禮。焚疏文，再揖，禮畢。俟雨水沾足，酬神。」²¹⁵

雖然各省督撫步禱祈雨之時，未必有民間力量參與，但民間往往組織有自發的祈雨活動，道光年間曾任湖廣總督的吳榮光(1773-1843)在其《吾學初編》「龍神祠」一條中言：「謹案，禮部每歲通行外省祭祀日期，有祀龍神祠月日，守土官曆奉遵行。至民間祈報，原所不禁，但不得斂錢賽會，演劇蟠燈，務華美而耗人口之資，習遊觀而荒四民之業，甚至爭道角勝，釀成鬥毆重案，尤為法所難貸。」²¹⁶ 可見，各省龍神祠廟因比時應宮更多了一層民間的宗教活動色彩。

2. 熱河龍神祠廟

在以上開列的十八位龍神中，以邊外龍神最為特別，蓋十七省及奉天龍神皆有具體所指之區域，而「邊外」則泛指「柳條邊」以西畜牧區及畜耕過渡區。值得玩味的是，清世宗所選擇供奉邊外龍神像的地方乃是熱河的避暑山莊。²¹⁷ 避暑山莊地處承德市境內武烈河之西岸，²¹⁸ 河水發源於群山之間，是周圍山區溝壑的唯一泄水通道。夏季汛期，其流

²¹⁴ [清]儲大文：《(雍正)山西通志》，卷一六四，《中國地方志集成·省志輯·山西》，第6冊，頁407下。河南總督田文鏡也曾步禱龍神廟祈雨，參見田文鏡：《雍正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一二六之十六，《四庫全書》，第421冊，頁467上。

²¹⁵ [清]李福泰：《(同治)番禺縣志》，卷十七，《中國地方志集成·廣東府縣志輯》，第6冊，頁187上。

²¹⁶ [清]吳榮光：《吾學錄初編》，卷九(吳氏筠清館清道光十二年刻本)，頁十六下。

²¹⁷ 本節所引用有關熱河行宮之清宮檔案，仰承避暑山莊研究室馬驍先生、陳東先生提供文獻線索，在此特別致謝。

²¹⁸ 「……武列溪，謂之武列水。東南歷石挺下，挺在層巒之上，孤石雲舉，臨崖危峻，可高百餘仞。」[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註：《水經註校註》，卷十四(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331。

域內常發生局部性暴雨，在極短的時間內爆發山洪，進而造成災害。²¹⁹

據避暑山莊檔案記載：「雍正五年十月內，由京送到『法林寺』、『暖流暄波』二處，供奉龍王二尊。」²²⁰ 其中大像應供奉於「暖流暄波」樓上，小像則供奉於如意洲法林寺之西配殿內。²²¹

(i) 建築規制及祀典源流

「暖流暄波」是一座緊依宮牆的歇山式二層閣樓，橫跨於避暑山莊東北隅武烈河引水入園的水口之上，是全園之要衝。根據陳設檔記載，龍神像即供奉於二層閣樓正中，²²² 似為取坐鎮水口之意（參見圖 10）。



圖 10 在遺址上復建的「暖流暄波」，其背後即避暑山莊宮牆，下方即水口（陳東、馬驍提供）

²¹⁹ 1994年7月，武烈河曾暴發嚴重水災，導致承德全市城鎮12座防洪壩破壞，武烈河大橋橋墩沉陷、橋面折斷。三千多戶居民住宅進水，供水、供熱設施遭到嚴重破壞。參見李志強：〈河北省1994年抗洪救災情況〉，《河北水利》，第5期（1994），頁3-10。

²²⁰ 台灣中央研究院：《中研院近史所藏內務府奏銷檔案全文》（2008年9月23日）。<http://www.ihp.sinica.edu.tw/ttscgi/ttsweb?@0:0:1:thii@@0.6947031573438576>，2018年9月1日查閱。

²²¹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活計檔〉云：「初二日，庫掌五德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暖流暄波並法林寺現供龍王，俱按法身量准尺寸，成做龍袍；其顏色花樣要與圓明園慈雲普護龍王所穿龍袍一樣，著給信京內畫樣發來。欽此。……隨將法林寺龍袍上改得徑九寸團龍樣，並將暖流暄波龍袍樣上改得徑一尺一寸團龍樣，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由此可見，暖流暄波之龍神像大於法林寺者。邢永福、師力武主編：《清宮熱河檔案》（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第9冊，頁388-389。

²²² 〈嘉慶二年十二月暖流暄波陳設檔〉，邢永福、師力武主編：《清宮熱河檔案》，第9冊，頁454-455。

「如意洲」是避暑山莊的核心景區，位於全園水系之中心，是創建伊始人工挖湖堆土所形成之島嶼，也是全園景點最為集中之處。法林寺創建於清聖祖時期，正殿五間供佛，西配殿三間，自京師送來的小尊龍神像即於此供奉。清聖祖在營造南區正宮之前，便於此生活起居、處理朝政。正宮建成之後，他則於此讀書賞景，與大臣一起觀戲。故而位於其東側的法林寺，宗教活動也極為豐富（參見圖11）。²²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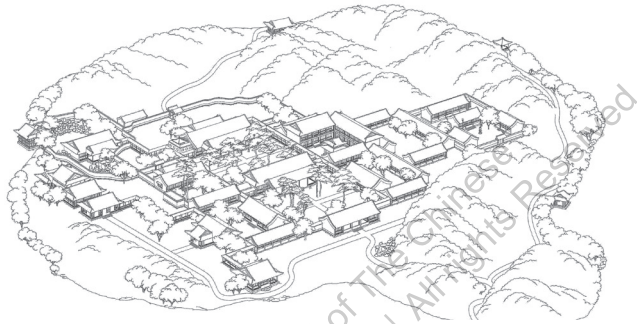


圖11 嘉慶時期避暑山莊如意洲復原圖，最右側之三合院即法林寺（張煒繪製）

「邊外福疆廣應龍王」雖然不載於正典之中，但一史館所存龍神圖樣中即已有之，亦見於避暑山莊檔案之中。²²⁴ 所謂「邊」者，乃指清廷為了保護滿洲龍興之地而修建的、用於限制人員出入的防禦構築「柳條邊」，²²⁵「邊內」以生態涵養和少量滿漢農耕為主，「邊外」即蒙古諸部遊牧區，有時也以法庫門為參照特指科爾沁草原。熱河一區位處邊外，同樣也是關外，是滿洲、蒙古各部和傳統漢族地區的交界處，自康熙朝開始，那裡逐漸成為清帝以「木蘭秋獮」、圍場巡狩之名義，會盟蒙古諸部的重要地點。²²⁶ 同時，此處也成為清聖祖因蒙古乾旱乏食而賑

²²³ 參見馬驍、陳東、張守仁：〈避暑山莊如意洲清盛時風貌考〉，《建築史》，第1期（2016），頁89-116。

²²⁴ 邢永福、師力武主編：《清宮熱河檔案》，第9冊，頁454-55。

²²⁵ 閻棟棟：〈試論清朝建設的柳條邊〉，《新西部》，第7期（2016），頁78、90。

²²⁶ 王曉輝引朝鮮人朴趾源語云：「熱河皇帝行在所……自康熙皇帝時，常於夏月駐蹕於此……地據險要，扼蒙古之咽喉，為塞北奧區。名曰避暑，實則天子身自防胡。」王曉輝：〈清帝巡幸熱河期間的政治活動與邊疆治理〉，《大連民族大學學報》，第2期（2017），頁104。

濟諸旗的平台。雖然清世宗在其任內從未臨幸避暑山莊，但「邊外」龍神之設顯然承續了乃父以此為窗口，懷柔蒙古諸部的用意。

(ii) 祈禱活動

避暑山莊的兩處龍神祠廟，自雍正五年便規定了詳細的奉祀標準：「每月供獻二次，用爐食，供二十碗，每碗八個，計一百六十個，銀四錢八分。」²²⁷《熱河園庭現行則例》中還規定了每月例用的費用：「園內舊有廟八處，月例香燈、供獻銀兩……龍王廟(暖流喧波牌位)……係各該管苑副經理。每月由香供項下領銀六兩七錢四分四厘外，正月、三月、四月、六月、十月、十二月等六個月加供。」²²⁸

在清高宗浩若煙海的御製詩中，有三首明確是為在熱河行宮法林寺祈雨靈應後所作。其在《留京大臣報雨詩以誌慰》一詩後註：「膳後即恭詣法林寺等處躬禱。」²²⁹《雨》(閏六月十九日)一詩中有「切感神庥澤賜饒」之句，高宗自註：「法林寺禱雨後，復至靈澤龍潭步禱，即見西南雲布，甘霖立霑。」²³⁰《喜晴》一詩有「禱神霑澤鑑微誠」之句，高宗自註：「予躬詣法林寺等處虔禱，即迓神庥，立時淫雨大霑。」²³¹可見，法林寺與圓明園「日天琳宇」同樣擁有皇帝在離宮親禱的壇所功能。

²²⁷ 台灣中央研究院：《中研院近史所藏內務府奏銷檔案全文》(2008年9月23日)。
<http://www.ihp.sinica.edu.tw/ttscgi/ttsweb?@0:0:1:thii@@0.6947031573438576>，
2018年9月1日查閱。

²²⁸ 石利鋒校點：《熱河園庭現行則例》(北京：團結出版社，2012)，頁220。

²²⁹ [清]清高宗御制詩餘集，卷十五，故宮博物院編：《清高宗御制詩》(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第19冊，頁408。

²³⁰ 同上註，頁408-409。

²³¹ 同上註，頁409。

(d) 黃河層面

1. 武陟嘉應觀：沁黃交匯處

(i) 創立始末

嘉應觀，俗稱廟宮，是清世宗於黃河沿岸所修建的第一座、也是最大一座龍神祠廟。²³² 它座落在河南武陟縣以南，秦家廠（今秦廠村）黃河故堤以北九華里處，位於沁水與黃河交匯河口之東北，即是康雍之際黃河屢屢決口之處。²³³

康熙六十年九月初，黃河水漲，沁黃交匯處的馬營口（今馬營村，位於嘉應觀東南約十六華里處）、詹家店（今詹店鎮，位於嘉應觀東南約十四華里處）等處大堤沖決，²³⁴ 大溜改經山東黃河故道入海，並湧入大運河，致使運河堤壩潰決，南北漕運阻滯，朝野震驚。清聖祖隨即自京中派遣副都御史牛鈕、侍講齊蘇勒、員外郎馬泰等三名大臣奔赴黃河岸邊，協助河道總督趙世顯以及河南巡撫楊宗義堵築河口。然而第二年六月，堤壩又一次沖決，²³⁵ 幾個月後，清聖祖駕崩於京郊暢春園。²³⁶

雍正元年二月龍抬頭這一天，清世宗傳諭給他剛剛任命的河道總督齊蘇勒：「秦家廠、馬營口左近，看一高阜之處，建造『淮黃龍王廟宇』，動用銀兩准在三萬上下。此廟內凡有會入黃河河道之龍神俱安奉配享。欽此。」齊蘇勒隨即與河南布政使牟欽元一同實地踏勘，選定秦家廠與馬營口之間的一塊高地作為廟基，²³⁷ 這裡位於沁黃交匯口的東北隅，距離黃河大堤僅六華里。擇此處修建龍神祠廟，明顯有安

²³² 武陟政協編訂：《武陟文史資料·嘉應觀專輯》（武陟：武陟政協內刊，1994）。

²³³ 有關嘉應觀建造的始末，參見丁文字：〈嘉應觀與雍正時期黃河治理〉（鄭州：中原工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7）。

²³⁴ 〈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二九四，《清實錄》，第6冊，頁855。

²³⁵ 同上註，卷二九七，《清實錄》，第6冊，頁882。

²³⁶ 同上註，卷三百，《清實錄》，第6冊，頁902。

²³⁷ [清]齊蘇勒：〈雍正元年二月初六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二上，《四庫全書》，第416冊，頁82上。

鎮河口的意圖(參見圖 12)。九月二日,齊蘇勒將工程預算上報清世宗,其「裝塑神像以及建造廟宇、木植、土石、磚瓦、石灰、釘鐵、顏料等項,並匠工銀,通共估用銀二萬八千九百三十八兩三錢零」。²³⁸清世宗在批復中再次言明,此次工程係由皇室內帑支出,並指示齊蘇勒可以直接挪用修築大堤的公款,待工程結束之後,內帑將直接還撥戶部充賬。²³⁹

雍正二年九月,負責具體督辦工程的河南布政使田文鏡呈上奏摺,匯報豫省南北兩岸堤工進展,廟工則可於歲內完成。²⁴⁰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四日,齊蘇勒匯報說:「今工程俱已告成,現在彩畫,於三月初旬即可全完」,並請求清世宗命欽天監選擇神像開光、懸掛御匾的吉日。²⁴¹但由於工程預算未按照琉璃瓦來計算屋頂鋪瓦,個別房屋的實際修建面積又有所擴大,導致出現了四千兩的費用缺口,田文鏡又於二月二十四日上摺,申請使用耗羨銀兩彌補缺口。²⁴²最終,按照欽天監所擇定的吉日,嘉應觀於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卯時開光,巳時恭上御書扁額」,「豫省士民莫不感頌皇恩,歡呼雷動」。²⁴³2001年,嘉應觀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²³⁸ [清]齊蘇勒:〈雍正元年九月初二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二上,《四庫全書》,第416冊,頁87上。

²³⁹ 同上註。

²⁴⁰ [清]田文鏡:〈雍正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一二六之二,《四庫全書》,第421冊,頁39下。

²⁴¹ [清]齊蘇勒:〈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二上,《四庫全書》,第416冊,頁97上。

²⁴² [清]田文鏡:〈雍正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一二六之三,《四庫全書》,第421冊,頁87下。

²⁴³ [清]田文鏡:〈雍正三年四月初二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一二六之四,《四庫全書》,第421冊,頁102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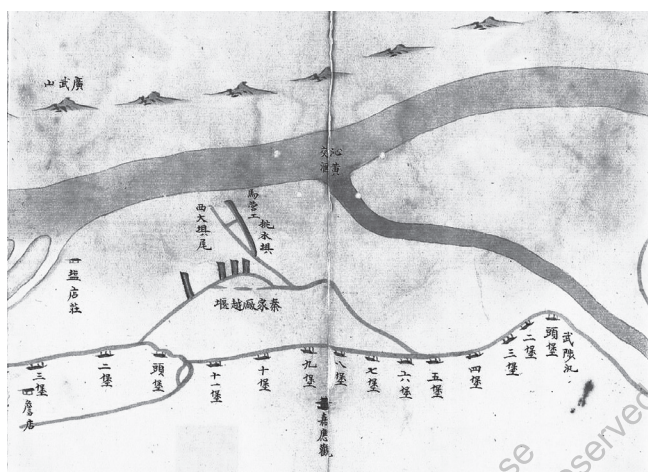


圖 12 《黃河防險圖》局部 (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繪圖者有意將嘉應觀之位置 (圖下部正中)
正對沁黃交匯河口 (圖上部正中)

(ii) 建築規制

嘉應觀分為南北兩個院區，西南側的附屬建築是前河道總督陳鵬年祠堂院。南區為泮池、石橋以及戲台院，北區即主體建築群，可分為三個部分。中間即廟宇主體，山門上奉安勅額：「勅建嘉應觀」，入門後為御碑亭，左右為鐘鼓樓，前殿（儀門）恭懸世宗御筆觀額「嘉應觀」三字。穿過儀門，進入主庭院，主殿在北面，東西各有配殿，以甬道相通。其中山門、鐘鼓樓與主殿皆以孔雀藍琉璃瓦覆頂。主殿後為一垂花門過廳，一座二層的禹王閣佇立於庭院最後。建築群的東區為河台衙署與道台衙署，西區為東河總督的駐地之一。這種廟、衙一體的平面佈局使嘉應觀成為一座真正意義上的集宗教與行政於一體的古建築群 (參見圖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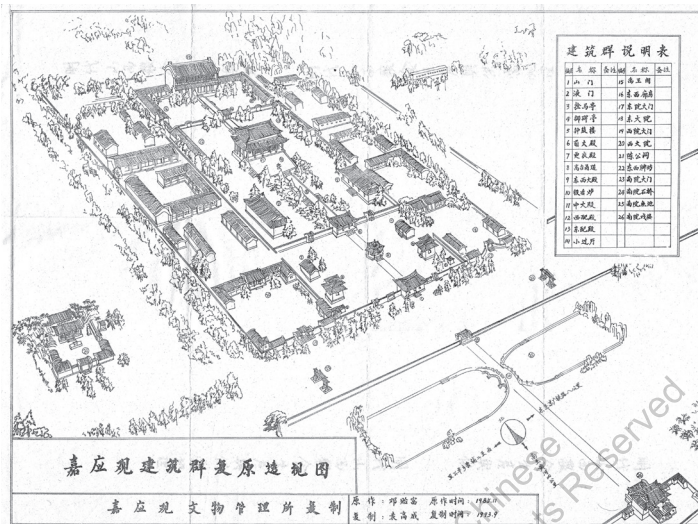


圖 13 嘉應觀鳥瞰圖（《武陟文史資料·嘉應觀專輯》折疊夾頁）

嘉應觀主殿，面闊七間，周匝回廊，重簷歇山頂，覆孔雀藍琉璃瓦，東西兩稍間開圓窗。此種規格的重簷歇山式建築不僅在清代京師的勅建廟宇內罕見，即便是全國範圍內亦屬中上等規模（參考圖 14）。此外，整個建築群的核心精華在於其御碑亭。其亭雙簷攢尖頂，上層圓形，下層六邊形，可能含有「天一生水，地六承之」之意。碑亭內安放銅質御碑一通，高 430 公分，寬 95 公分，厚 24 公分。碑座與常見石碑不同，乃一獨角蛟龍，據傳其下為一直通黃河的水井。這一銅碑是我國現存同類文物中體量最大的一座，²⁴⁴ 原係河道總督齊蘇勒用以彰顯皇恩之物。清世宗曾因銅碑訓斥齊蘇勒曰：「茲各省開爐鼓，鑄錢文、銅觔，每慮不敷，何必作此無益之費，兼恐將來啟人效法之端也。」²⁴⁵ 可見銅碑之鑄造，並非如一些人所言，是清世宗之別出心裁。

²⁴⁴ 武當山太和宮及泰山碧霞祠均留存明代銅碑，但體量不及此。

²⁴⁵ [清]田文鏡：《雍正三年四月初二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一 二六之四，《四庫全書》，第 421 冊，頁 103 下。



圖 14 嘉應觀御碑亭、儀門、正殿以及東西配殿（左：王磊攝；右：陶金攝）

2. 皂河龍王廟：黃運交匯處

(i) 創立始末

安瀾龍王廟座落在江蘇省宿遷城西之皂河集（今皂河鎮），是清世宗在黃河江南段²⁴⁶所勅建的龍神專祠。²⁴⁷皂河鎮處於黃河與大運河之間的夾隙陸地上，此段大運河又係沿駱馬湖沿岸築堤而成，故而在皂河一處，駱馬湖、大運河、黃河三個水體互相只有一堤之隔，又相對獨立。皂河鎮西南約八公里的朱家口（今朱海村）段黃河曾於雍正三年決口，河水氾濫，衝擊睢寧和宿遷南境，河道總督齊蘇勒親自指揮，歷時一年半才將決口堵塞合龍。清高宗在其《御製皂河龍王廟碑》中稱：「其地前控大河，後臨運道，洪流遡波，遠近奔匯，號為最險。」²⁴⁸這種險要而又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商賈雲集的皂河鎮成為防汛重地（參見圖 15）。

²⁴⁶ 非言黃河位於長江之南，乃言其位於江南省之地界，由江南河道總督負責修造、管理。清代江南省大抵今日江蘇、安徽兩省之範圍。

²⁴⁷ 有關嘉應觀建造的始末，參見褚福樓：〈明清時期金龍四大王信仰地理研究〉（廣州：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²⁴⁸ [清]李德溥：《（同治）宿遷縣志》，卷一，《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台灣：成文出版社，1974），第141號，頁32。

王廟作為大運河的有機組成部分之一，被列入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齊蘇勒在選定修建江南龍神祠廟的同時，還查訪到了傳為金龍四大王生前原籍的浙江錢塘縣祠墓，並在同一奏摺中向清世宗匯報：「再查金龍四大王，姓謝名緒，係浙江錢塘縣下墟裡人……其墓即在下墟之金龍山內……共應需銀三千九百餘兩，可以煥然完固……。臣思本籍祠墓，乃靈爽之所憑依，況河神翊戴聖朝，屢多顯應，似當將其本籍祠墓亦行修整，以彰盛典。」²⁵³ 清世宗亦批復同意了原籍祠墓的工程，並指示齊蘇勒，這兩處工程「仍照豫省新建廟例，動用內帑修理，不拘何項錢糧，暫時挪用後，諮明戶部，在京抵銷可也」（參見圖16）。²⁵⁴ 龍神廟的修建與維護並非內府獨資，而是中央與地方的聯同協作，除內帑外，淮徐道道台康宏勳申請捐資為宿遷與錢塘兩處祠廟購置香火地，清世宗在准許之外，還專門囑咐：「廟宇工程出於朕之誠意，毋容捐助。置買田地以為香火之資，康宏勳（生卒年不詳）既有此願，自屬可行。」²⁵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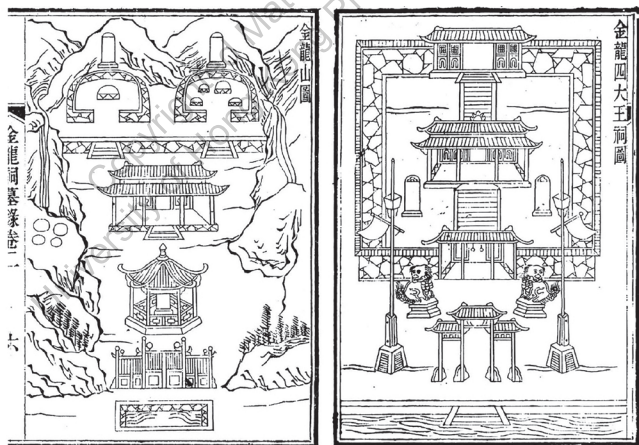


圖16 金龍山墓圖(左)、金龍四大王祠圖(右)(《金龍四大王祠墓錄》)

²⁵³ [清]齊蘇勒：〈雍正五年正月二十八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二下，《四庫全書》，第416冊，頁112上。

²⁵⁴ 同上註，頁112下。金龍四大王祠墓現已無存，限於篇幅本文暫不對其進行討論。

²⁵⁵ [清]齊蘇勒：〈雍正六年四月初十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二下，《四庫全書》，第416冊，頁123上。

(ii) 建築規制

與嘉應觀一樣，作為江南河道的龍神祠廟，皂河龍王廟也由齊蘇勒經手建立。雖然奏摺中所稱係將原有廟宇改建，但就目前建築所見，其在建築尺度以及工藝細節上，雖然略遜於嘉應觀，但在佈局規制以及建築規制等方面，幾乎可以說是嘉應觀的翻版。這兩座建築群均在2001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目前尚未見對兩廟建築類型的論述，在此僅簡要陳述。

從佈局而言，皂河龍王廟雖然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南北區之分，但山門以南的過街牌坊與戲台的佈局形式以及戲台的建築形式與嘉應觀完全一致。²⁵⁶ 此外，廟院本身也規整地分為東、中、西三區，中區為核心廟院，其殿堂形制與佈局安排也同為：山門、御碑亭，前殿（儀門）、主殿、過廳、禹王閣的次序。東西兩區為院落式建築，現已不存。

再從建築風格而言，地處江淮地區的皂河龍王廟是一座典型的北方官式建築，這一點充分說明了其與嘉應觀一樣，得到了國家與皇室層面的贊助。此外，兩廟的山門、兩側影壁，以及角門的組合形式，乃至山門內鐘鼓樓的卷棚頂，皆基本一致，屬於典型的官式風格。皂河龍王廟主殿的建築量稍小，但規制與嘉應觀完全一致：面闊七間，周匝回廊，東西兩稍間開圓窗，重簷歇山頂，覆琉璃瓦。清代官式殿堂建築使用圓窗並非十分常見，因此兩者的近似絕非偶然。

兩廟最具關聯的地方是樣式完全一致的御碑亭。皂河龍王廟的御碑是乾隆元年清高宗所制，並非齊蘇勒修廟時所創建，這也就意味著，直至乾隆元年（齊蘇勒已歿）增建御碑亭時，負責營造的江南河道官吏、工匠仍然自覺地取法於皂河龍王廟的母本：武陟嘉應觀，並在皂河進行縮小版的復建。

²⁵⁶ 此兩處戲台均為卷棚歇山方亭與硬山排房所組成的凸字形建築。

3. 蘭陽惠安觀：北岸改道處

(i) 創立始末

惠安觀是清世宗勅建奉安關帝神像以及河神的祠廟，因河道總督常駐此閱工，故而在民間與武陟嘉應觀同有「廟宮」之稱。它座落在當時河南蘭陽縣（今河南蘭考縣）的黃河之北岸，其境內的銅瓦廂是歷史上黃河多次決口並改道北上之要衝，清咸豐五年（1855），黃河再次於此決口北上，奪濟入海，最終形成今日黃河之走勢。雍正六年初春，蘭陽縣境內板廠段黃河決口，有關帝像自上游漂浮而至，而此時漫水之處也隨著神像的到來，自行沙淤，險象遂平。清世宗聞說此事，感嘆「甚屬奇事」，特傳諭河臣齊蘇勒、嵇曾筠為漂來的關帝神像「於此處另建寬大廟宇，以答神庥」。²⁵⁷ 乾隆四年，清高宗還專為惠安觀撰寫了御製碑文。²⁵⁸ 惠安觀現已無存。

(ii) 建築規制

《蘭陽縣續志》中所繪《勅建惠安觀圖》是目前唯一可以探知其廟宇規制的資料，雖然信息有限，但仍可發現其與嘉應觀、皂河龍王廟的關聯。首先在佈局上，山門以外設東西過街牌坊並正對戲樓，主體部分橫向劃分為三區，並於中區設山門、御碑亭以及主殿，此都與前兩廟一致。稍有不同的是，該廟東西兩區分別辟為風、火神祠，²⁵⁹ 並單獨開設廟門。兩廟之後，依舊是河道公館及道院（參見圖 17）。惠安觀建築佈局的重大特色在於其主殿之後設置關帝殿一座，供奉隨洪漂來的關帝神像。更為特別的是，惠安觀最後一進殿宇所供奉的是當時尚未得到勅封的「新河神」黃大王。

²⁵⁷ [清]嵇曾筠：〈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一七五之二，《四庫全書》，第423冊，頁536下。

²⁵⁸ [清]徐光範：〈蘭陽縣續志卷首〉，《蘭考舊志彙編》（蘭考：河南省蘭考縣志編纂委員會，1984），上冊，頁319。

²⁵⁹ [清]嵇曾筠：〈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一七五之二，《四庫全書》，第426冊，頁537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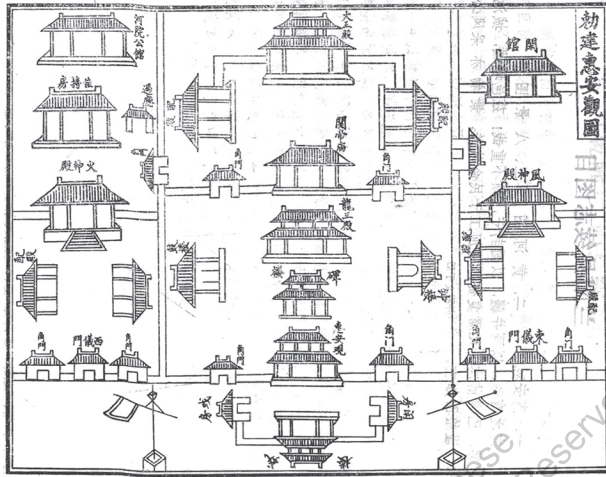


圖 17 《勅建惠安觀圖》（《蘭陽縣續志》，頁 318）

4. 循化河源廟：大禹導河處

(i) 創立始末

河源廟是清世宗為了達成在黃河源頭祭祀河神的想法而創建的神祠，位於甘肅積石關以西七十華里之撒喇城堡（即今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縣縣城）。這裡的積石關不僅被古人認為是大禹開導黃河之處，²⁶⁰ 也被當代科學家認為是導致西元前 1920 年左右一次巨大洪水的堰塞湖遺跡。²⁶¹ 此外，積石關在歷史上是農業文明與遊牧文明的分界線及軍事要地。清代康熙、雍正兩朝，以西寧為政治中心的青海曾是鎮壓羅卜藏丹津叛亂的重要用兵之地，²⁶² 而河源廟勅建之時，也正是清廷大軍準備平定準格爾之際。²⁶³

²⁶⁰ 《尚書·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入於滄海。」[清]孫星衍撰，陳抗、盛冬鈴點校：《尚書古今文註疏》，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188。

²⁶¹ Qinglong Wu et al., “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 *Science* 353, 6299 (2016): 579–582.

²⁶² 陳柏萍：〈康熙雍正時期青海駐軍考述〉，《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 期（2011），頁 50–56。

²⁶³ 白彬菊：《君主與大臣：清中期的軍機處（1723–1820）》（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頁 130–152。

雍正八年四月十日，清世宗上諭內閣，稱黃河「上通雲漢，光啟圖書」，國朝定鼎以來，黃河多次顯現祥瑞，雍正五年初黃河澄清長達七旬，清世宗「因念江南、河南等處，皆有廟宇，虔恭展祀，而河源相近之處，向來未建專祠，以崇報享典禮，亟宜舉行」，²⁶⁴並請內閣及九卿在黃河流入內地的西寧選址，並詳議營建河源神祠的事宜。五月十五日，禮部回復清世宗，在查閱了河神祀典後，請青海督撫差員於河州口外選擇廟址。七月，河州地方稟奏，積石關外七十里處有草灘臨黃河，適宜建廟，且附近設有營堡（即後來循化廳所在地，今之循化縣城），便於管理。十一月，河州方面又擬定祠廟規制，預算需銀約五千兩。其工程始於雍正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於同年七月十二日竣工。²⁶⁵雍正十年，清世宗親自撰寫了御製碑文，頒發青海，記述了河源廟在創建過程中的兩次祥瑞。同治三年（1864）三月，循化撒拉族發生伊斯蘭教教爭，河源廟被焚，後經拉撲楞寺會同張沙寺活佛喇嘛倡導得以重修，光緒三十二年，又由張沙寺卡丹拜堅活佛重修，並於宣統元年完工。文革中，河源廟遭到破壞，²⁶⁶並在近年得到了復建。

(ii) 建築規制

根據河州方面公議，擬建「大門、二門、大殿、寢殿，俱南向，以昭享祀之誠。復造望河一樓，於寢殿之後，另塑神像，面臨黃河，以便閱」。²⁶⁷與河南、江南幾處龍神祠廟的佈局相比，這一佈局具有更為傳統的「前朝後寢」、「坐北朝南」的規制與朝向。但由於「積石關外，黃河環繞於北」，故而在寢殿之後建造望河樓，保證神明能夠「閱視河流」。總體來看，由於廟宇的籌建並非由內地河臣謀劃，故而體現出了與嘉應觀一系龍神祠廟完全不同的規劃設計思路。雍正十三年，清世宗遣官祭祀河源神祠之後，又應太常寺卿之請，添建了御碑、御製祭文兩座碑亭。²⁶⁸

²⁶⁴ 〈雍正八年四月初九日上諭〉，收入《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九十五，《四庫全書》，第415冊，頁443下。

²⁶⁵ [清]李本源：《（道光）循化廳志》，卷六（清道光二十四年抄本），頁二上。

²⁶⁶ 郭喬五：〈循化河源廟之今昔談〉，頁37-42。

²⁶⁷ [清]李本源：《（道光）循化廳志》，卷六（清道光二十四年抄本），頁四上。

²⁶⁸ 同上註，頁九上。

5. 陳留溥仁觀：南岸水患處

(i) 創立始末

溥仁觀是清世宗應河東總督王世俊所請，於黃河南岸所勅建的龍神祠廟，座落於陳留縣北五十里曲興鎮，是清中期黃河南岸多次決口之處。²⁶⁹ 雍正十一年正月，王世俊(?-1755)出任河東總督，同年七月，黃河水漲，陳留堤壩岌岌可危，他便向河神默禱，若能水退則建廟致祭，其後果然水勢立減。雍正十三年閏四月，他向清世宗呈摺，言明此事，並表示河南百姓皆認為黃河北岸之所以安瀾，皆因勅建兩觀安鎮，故南岸亦應有之，當時已有副總河捐銀一千兩，他本人亦捐銀五百兩作為啟動之資，並於閏四月初八開工，希望清世宗能夠頒賜御製匾額。清世宗從其所請，並以國帑支持。²⁷⁰ 雍正十三年六月，廟宇將成之時，黃河再次漲水，離廟三十里的程家寨大堤裂開百餘丈，此時神明再次顯靈，指導官員加固大堤，轉危為安。王世俊為此再請於朝，清世宗賜額曰：「溥仁觀」，並擬定了「惠應安瀾」的御書匾額。²⁷¹

(ii) 建築規制

溥仁觀現已無存，地方志中亦無廟圖。按王世俊所言，前有重門，兩側為鐘鼓樓，後為正殿、禹王殿，以及玉皇閣；主院兩側又有「齋寢庖湑，及經之藏室，僧之寮房，無不悉具」。²⁷² 王世俊修建溥仁觀之始，應當也參照了嘉應、惠安二觀的大致規制。

²⁶⁹ 有關溥仁觀及黃大王崇拜，可參見衛文輝：〈民間信仰的當代建構〉（鄭州：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胡夢飛：〈官民互動的典範：明清時期河神黃大王信仰的歷史考察〉，《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2017），頁65-71。

²⁷⁰ 〈雍正十三年閏四月初八日王世俊恭報修葺河廟摺〉，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第28冊，頁208。

²⁷¹ 由於清世宗駕崩，乾隆三年才由清高宗御制匾額，並賜出懸掛。[清]王世俊：〈重建河神廟碑記〉，收入[清]阿思哈：《（乾隆）續河南通志》，卷十七（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頁七下。

²⁷² 同上註。

6. 祀典源流

(i) 金龍四大王

「河伯」(或言冰夷)作為黃河之神,其崇拜自戰國以來即已形成,《楚辭·九歌》、²⁷³《莊子·秋水》、²⁷⁴《山海經·大荒東經》²⁷⁵中均已有記載,並具有強烈的擬人化人格。漢宣帝將五嶽、四瀆的祀典制度化,黃河之神從此成為四瀆之一,其強烈的個性在官方祀典中逐漸被淡化。唐玄宗將四瀆封以公爵,河瀆稱「靈源公」,²⁷⁶至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又將岳鎮海瀆革去國家封號,河水之神只稱「西瀆大河之神」。至此,官方的黃河之神已被認定是純粹的「英靈之氣,萃而為神」,²⁷⁷這與動物神的河伯或人面蛇身的冰夷已經毫無相似之處了。

自明初以來,金龍四大王在民間層面逐漸成為黃河中下游以及大運河沿岸香火最為鼎盛的河神,褚福樓建設性地提出了金龍四大王源自徐州黃河故道呂梁洪一帶的「金龍」崇拜,與南宋杭州人謝緒並無直接關係,²⁷⁸但至少在清世宗時期,人們已將謝緒與金龍四大王相互關聯起來。根據褚福樓的研究,明代金龍四大王的崇拜中心位於兗州、徐州、淮安三府的黃河、運河交匯地區,並逐漸向黃河中游以及大運河南北兩方向傳播,由此形成大運河、黃河兩個主要崇拜區域。至清代,河南黃河沿岸各府、縣,大運河沿線北至京畿,南至紹興,均建有金龍祠廟。

雖然金龍四大王在民間的香火十分鼎盛,但直到清順治二年,才被朝廷勅封為「顯佑通濟金龍四大王」,²⁷⁹由此進入祀典。康熙四十年,清聖祖准河道總督張鵬翮(1649-1725)之請,加封「昭靈效順」四字封號,²⁸⁰並於康熙四十三年規定春秋致祭。²⁸¹即便如此,官方也

²⁷³ [戰國]屈原:《九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頁26。

²⁷⁴ 陳鼓應註譯:《莊子今註今譯》,中冊,頁411。

²⁷⁵ 馬昌儀:《古本山海經圖說》,頁547。

²⁷⁶ [五代]劉昫:《舊唐書》,卷二四,第3冊,頁934。

²⁷⁷ [清]張廷玉:《明史》,卷四九,第5冊,頁1284。

²⁷⁸ 關於金龍四大王的研究已非常之豐富,其中較為全面分析其崇拜源流及其地方影響者,可參見褚福樓:《明清時期金龍四大王信仰地理研究》。

²⁷⁹ [民國]趙爾巽等:《清史稿》,卷一二六,第13冊,頁3716。

²⁸⁰ 《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二〇三,《清實錄》,第6冊,頁70。有清一朝,金龍四大王共被勅封、加封18次,共計44字,位居群神之冠,僅山東巡撫丁寶楨一人便曾請封三次,共計六字的封號。

²⁸¹ 《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二一五,《清實錄》,第6冊,頁180。

從未公開認定金龍四大王即是黃河河神，這種官方的認定是通過清世宗勅建嘉應觀來委婉實現的。

根據奏摺來看，清世宗在雍正元年將其武陟修建的廟宇稱之為「淮黃龍王廟宇」，²⁸² 此後一直到雍正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河南巡撫田文鏡在奏摺中，才將該廟稱之為「金龍神廟」，²⁸³ 而在同年四月初十日，河道總督齊蘇勒在奏摺中，將此廟稱之為「河神廟」。²⁸⁴ 按齊蘇勒與田文鏡互為同僚，共同負責河工以及廟工，不存在互相理解有誤的情況，故而，不論清世宗在雍正元年初發上諭時，是否已經認定供奉金龍四大王，但在雍正元年至三年之間的這段時間裡，君臣上下都達成了一個共識：金龍四大王即黃河龍王，亦即黃河河神。雍正八年，當清世宗擬勅修黃河河源之廟，請九卿詳議加封神時，禮部曾提及：「康熙三十九年加封黃河神為『顯佑通濟昭靈効順金龍四大王』」，²⁸⁵ 可見，此時禮臣也已經默認金龍四大王即是黃河河神了。

(ii) 黃大王

就在清世祖初次勅封金龍四大王的這一年，另一位河神「黃大王」的香火在中原黃河兩岸漸漸興起。與金龍四大王（謝緒）身後顯靈不同，²⁸⁶ 黃大王其人在生前便已被黃河沿岸官民認定為一位「活河神」。據《靈佑襄濟河神黃大王事蹟全志》記載，黃大王本名黃守才，河南偃師人，生於明萬曆三十一年，卒於康熙二年，他自幼便顯示出落井不沉、入水不溺的奇事，並由前明運糧官認定為夢中的「活河神」，之後又施展出退沙、避寇、堵口、祈雨等一系列神蹟，故而當他還在世時，民間便已私立生祠。²⁸⁷ 其歿後，黃河沿岸更是新建多處「大王壇」，供奉其香火。雍正十一年，王世俊向清世宗奏擬重建的「南岸舊廟」即是一座

²⁸² [清]齊蘇勒：〈雍正元年二月初六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二上，《四庫全書》，第416冊，頁82下。

²⁸³ [清]田文鏡：〈雍正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一二六之三，《四庫全書》，第421冊，頁87上。

²⁸⁴ [清]齊蘇勒：〈雍正三年四月初十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二上，《四庫全書》，第416冊，頁98下。

²⁸⁵ [清]李本源：《〈道光〉循化廳志》，卷六（清道光二十四年抄本），頁2上。

²⁸⁶ [清]仲學略：《金龍四大王祠墓錄》，卷一（錢塘：丁氏嘉惠堂，光緒丙申年刻本）。

²⁸⁷ 〈勅封靈佑襄濟河神黃大王事蹟全志〉，收入中國水利史典編委會編：《中國水利史典：黃河卷》（北京：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15），第3冊，頁61。

「大王壇」，²⁸⁸ 雖然黃大王當時未被列入祀典，但王世俊在重修時也未將其視作淫祠移除，而是以調和的方式在正殿中加入已被勅封的金龍四大王。乾隆三年，河東總督白鐘山（1682–1761）與河南巡撫尹會一（1691–1748）上摺，為黃大王請勅封號，並稱：「（溥仁觀）經前督臣王世俊因觀宇傾圮，恭折具奏，欽奉世宗憲皇帝諭旨特命動帑興修，重新廟貌，以佑河工。現在正殿供設河神二尊，一為金龍四大王，一為黃大王，誠聖朝崇德報功之盛典也。」²⁸⁹ 也就是說，王世俊將大王壇改建為二王並存，實際為乾隆朝的正式勅封做了必要的鋪墊。

(iii) 大王將軍諸神

隨著雍正朝金龍四大王的崇祀以及乾隆朝黃大王的勅封，黃河沿岸逐漸構建起了一個由大王、將軍組成的河神系統。²⁹⁰ 其中大王神一共六位，除了金龍與黃大王係因靈異而封神外，其餘的朱、栗、宋、白四位大王生前均係明清兩朝河臣（參見圖 18）。²⁹¹ 值得玩味的是，不論這幾位河神大王是否曾是生人，黃河、運河沿岸的官民一致認為他們都能以蛇形來示現法身，²⁹² 這從另一個角度也反映了民眾對於黃河河神同時兼具龍神神格的理解。

將軍神人數眾多，清光緒十五年所編《勅封大王將軍畫像》共開列有將軍神六十四位，胡夢飛將其分為三類：第一類為生前恪忠職守的下層河工官吏，第二類為生前有靈異神跡者，第三類為治河工程中的殉人。²⁹³

²⁸⁸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三（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頁412。

²⁸⁹ 《奏為俯順輿情請勅賜河神封號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宮中檔硃批奏摺，04-01-05-0006-004（乾隆三年）。

²⁹⁰ 總體來言，雖然這些大王、將軍中的絕大多數為清世宗之後被勅封，但清世宗時期已有部分列入祀典者。

²⁹¹ 朱大王為清順治朝河道總督朱之錫（1622–1666），乾隆四十五年勅封「助順永甯侯」。栗大王為清道光朝東河總督栗毓美（1778–1840）。宋大王為明永樂朝治理黃河的工部尚書宋禮（1361–1422），明弘治中立祠祭祀，雍正四年勅封「寧漕公」，光緒五年勅封「顯應大王」。白大王為明初協助宋禮治理黃河的山東汶上縣老人白瑛（生卒不詳），雍正四年勅封「永濟之神」，光緒五年加封為「昭宣大王」。

²⁹² 胡夢飛：〈「河神大王」：晚清黃運沿岸地區祀蛇風俗考述〉，《淮陰師範學院學報》，第4期（2017），頁410–415。

²⁹³ 胡夢飛：〈明清時期黃運地區的「大王」和「將軍」〉，《尋根》，第5期（2017），頁15–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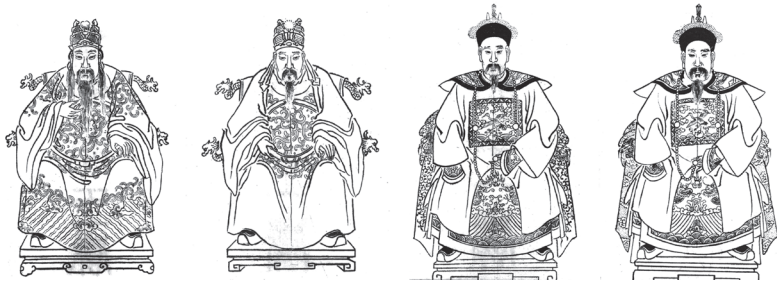


圖 18 金龍四大王、黃大王、朱大王、栗大王肖像（《勅封大王將軍畫像》）

雍正八年，清世宗勅修河源神廟，並擬加封神號。禮臣在題奏中有意繼續在此廟中延續金龍四大王的祀典，但最終所勅封的則是「開津廣濟佑國庇民昭應河源之神」，²⁹⁴ 與上述的時應宮龍神一樣，這也是清世宗新封之神。也許清世宗意識到，遠在西北的少數民族聚居區，民眾對黃河、運河地區的信仰毫無所知，故而重新勅封為自然神神格，連龍神之號亦免去了。²⁹⁵

7. 祈禱活動

清世宗在創建嘉應觀伊始，並未設立定期的祭祀制度，僅是在汛期或有險情時，由「河工廳員逢時致祭」。²⁹⁶ 但在雍正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以及十二年，都由清世宗派遣廷臣或河道總督致祭，其「祭文由翰林院撰擬。香帛由太常寺、祭品由地方官備辦」，²⁹⁷ 這種制度謂之「遣祭」。清世宗一朝，武陟嘉應觀與江蘇淮安清口河神廟一併遣祭，與此對應的是行政上的河東河道與江南河道（清口為江南河道總督駐地）。除嘉應觀外，皂河龍王廟、蘭陽惠安觀等處，也由地方或河道官員逢時祭祀，直到乾隆五十三年，才改為春秋致祭。

除皂河龍王廟由僧人住持外，河南幾處龍神祠廟皆以觀為名，故應為道士住持。王法星在《嘉應觀的道士》一文中，開列嘉應觀可考道

²⁹⁴ [清]昆岡等：《（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四四二（光緒二十五年刻本），頁三上。

²⁹⁵ 相似的例子還見於浙江海神廟的勅封神號，詳見下文。

²⁹⁶ [清]昆岡等：《（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四四二（光緒二十五年刻本），頁七上。

²⁹⁷ 同上註，卷四四一（光緒二十五年刻本），頁十上。

士的姓名，從其派譜來看，當係全真華山派。²⁹⁸ 雖然我們尚未看到有關道士參與慶典及祈禱活動的記載，但當下武陟地方以二月初二龍抬頭為嘉應觀傳統廟會，則觀中道士很可能曾是這一廟會的核心角色之一。

位於積石關外的河源廟與河南、江南的情況並不太相同，在禮部議奏之初，便已確立由地方官員春秋致祭的成例，雍正十一年、十三年，清世宗曾兩次遣祭。在河源廟建立之初，曾派遣漢僧四人負責住持管理河源廟，但雍正十三年太常寺卿來此致祭時，發現「原住青衣僧四人不通番語，土番不能信服」。²⁹⁹ 因此，他另選黃衣僧（藏傳佛教僧侶）二十人，從河廳供給其口糧用度，並添置了法器和住房。清末民國時期，河神廟由張沙寺所派的九名喇嘛負責管理，並有日常佛事活動，口糧等項則由循化縣撥發。³⁰⁰ 通過住持喇嘛的影響，由清世宗所勅建的河神廟，逐漸成為了循化漢藏兩族社會生活中的有機組成部分。

(e) 江海層面

1. 海寧海神廟

海寧海神廟，俗稱廟宮，³⁰¹ 是清世宗因海塘安瀾而勅建的海神祠廟，座落在浙江海寧州（今海寧市鹽官鎮）城東。³⁰² 上文言，雍正二年七月十九日，東海颶風對江南、浙江地區的海塘產生了巨大的破壞，為此清世宗專門發撥帑銀，派遣大臣奔赴江南、浙江，改建境內部分土塘為石塘。³⁰³ 清世宗認為：「水患雖關乎天數，或亦由近海居民平日享安瀾之福，絕不念神明庇護之力，傲慢褻瀆者有之。」為此他專發上諭解釋了敬神之道：「能敬則謂之順天，不敬則謂之褻天。褻天之

²⁹⁸ 王法星：〈嘉應觀的道士〉，《武陟文史資料：嘉應觀專輯》（武陟：武陟政協內刊，1994），頁138-140。

²⁹⁹ [清]龔景瀚編，[清]李本源校：《（道光）循化廳志》，卷六（清道光二十四年抄本），頁八上。

³⁰⁰ 郭喬五：〈循化河源廟之今昔談〉，頁42。

³⁰¹ 海寧本地百姓稱呼海神廟為「廟宮」，此外，近年來在整修海神廟的過程中發現了同治十二年所造刻有「廟宮定造」的青磚。周建初：〈海寧海神廟可移動文物調查〉，《東方博物》，第4期（2017），頁76-83。

³⁰² 有關海寧海神廟的建造始末，參見鄒愛蓮：〈雍正皇帝與浙江海寧海神廟〉，《浙江檔案》，第11期（2015），頁46-51。

³⁰³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四日上諭〉，收入[清]翟均廉：《海塘錄》，卷首一，《四庫全書》，第583冊，頁321下。[清]張楷：〈雍正三年十一月初十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三二，《四庫全書》，第418冊，頁77下。

人，願可望綏寧之福乎？」他一面表示，作為皇帝，對此天災負有責任，但也希望沿海百姓能一同敬神順天，「內盡其心，外盡其禮，敬神如神在，實以至誠昭事，而不徒尚乎虛文」，如此才能「永慶安瀾」，³⁰⁴ 此可謂是其一貫的天人感應神學思想。

雍正七年八月，浙江總督李衛呈摺申請丁憂回鄉，並交接海塘事務，清世宗在硃批中讚賞他工作勤勉，因此感和神力保護海塘，並首次言明打算修建海神祠廟，「以祈佑庇兆庶」。³⁰⁵ 農曆八月正是錢塘江大潮之際，這一年的海潮又比往年更大，地方官員皆認為有海塘坍塌之可能，這令清世宗頗為焦慮。但稍後傳來的盡皆喜報，即便是潮水最大的八月十六、十七、十八這三日，也都未能對海塘構成威脅。³⁰⁶ 為此，清世宗在錢塘大潮六日後頒發上諭，感念自雍正二年以來，「塘工完整，災沴不作，居民安業，蓋已默叨神佑」，此次大潮又能安然無恙，「皆神明默垂護佑，惠我烝民者也」。為此，他宣佈出內帑十萬兩在海寧修建海神祠廟，並強調「務期制度恢宏，規模壯麗」，為的是要讓遠近人民奔走瞻仰而興起敬神之心，「服教畏神，遷善改過，永荷休祥，則於國家事神治人之道，均有賴焉。」³⁰⁷

同年十一月，李衛在從家鄉返回杭州的路上，先行前往海寧，為新建海神廟選得城東一塊基址，又徵集了周圍部分民宅土地，這一地塊坐北朝南，正對錢塘江大堤。同時，他擔心此項工程巨大，身邊又缺乏堪用之人，故專門行文山東，調撥負責曲阜孔廟修繕工程的工部書辦張爾召（生卒年不詳）。此外，他又向清世宗呈摺，希望能夠調用兩位辦事謹慎的革員專門負責工地事務，得到了批准。³⁰⁸ 第二年春，李衛派官前往江西、湖南、福建採辦木材。三月初一日，正式祀土開工，將地盤清出放線，同時又向清世宗呈摺，請定廟中祀典，並隨摺

³⁰⁴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上諭〉，收入《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二三，《四庫全書》，第414冊，頁195上。

³⁰⁵ [清]李衛：〈雍正七年八月十一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一七四之十，《四庫全書》，第423冊，頁254下。

³⁰⁶ [清]性桂：〈雍正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一七七，《四庫全書》，第424冊，頁20下。

³⁰⁷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上諭〉，收入《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八五，《四庫全書》，第415冊，頁328上。

³⁰⁸ [清]李衛：〈雍正七年七月十五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一七四之十，《四庫全書》，第423冊，頁262上。

呈覽了廟工圖示，清世宗從其所奏。³⁰⁹ 至當年十二月，建築基礎、圍牆均已施工完畢，只待「湖廣之木並白石大柱一經運到，則正殿新春即可上樑」。³¹⁰ 雍正九年四月，海神廟上樑儀式正式舉行，據李衛所見當時之盛況，「闔縣紳衿耆老，黎庶工匠人等，無不額手慶倖，商賈居民，張燈結綵，鼓吹三日」。³¹¹

(i) 建築規制

海甯海神廟總面積達2.7公頃，歷史上曾於太平天國時期受到損毀，東西兩側廟基逐漸淪為民居，但經過清末的重修，目前主體建築保存尚屬完整，與武陟嘉應觀、蘭陽惠安觀極為相似。首先是門前區域，由東西過街牌坊及戲台構成，戲台雖然是近年復原之物，但復原後的形制與武陟、皂河者完全一致。主體建築群亦分為東、中、西三區，中區為海神祠廟主體，分別為大門、儀門、主殿、過廳、御碑亭、寢殿樓。東區為天后宮及道院，西區為風神殿、水仙樓及道院。廟內並未設立官廳，這大概是因其座落於海寧州（今鹽官鎮）城廂之緣故（參見圖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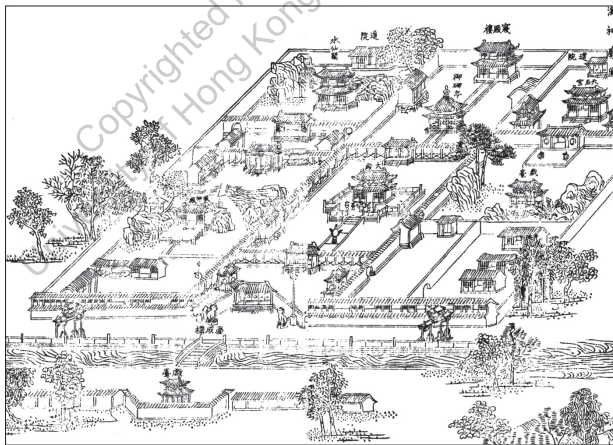


圖19 海神廟圖（《浙江通志》，卷一，頁222-223）

³⁰⁹ [清]李衛：〈雍正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一七四之十一，《四庫全書》，第423冊，頁311上。

³¹⁰ [清]李衛：〈雍正八年十二月初四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一七四之十二，《四庫全書》，第423冊，頁349上。

³¹¹ [清]李衛：〈雍正九年五月初六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一七四之十三，《四庫全書》，第423冊，頁359下。

從建築風格而言，海神廟並非純粹的江南本地建築風格，反而體現了北方官式建築的硬朗輪廓，因此一些建築學者也將其視為官式建築。³¹²再者，從建築佈局、風格，再到「廟宮」這一名稱的繼承使用，都說明了經理此項工程之人，不僅熟悉官式建築營造，而且對黃河沿岸的幾處廟宮也了然於胸。根據李衛所呈奏摺，他在向山東方面調人失敗之後，得到了河南巡撫田文鏡所派送的王元清（生卒年不詳），王本人很可能深度參與了武陟廟宮的營造，但李衛仍執著地懇請世宗能夠命工部派遣「料估之人帶同匠頭前來」。³¹³所以，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海寧海神廟，之所以如此「官式」，與李衛竭力地在全國範圍內調動人力資源有著直接的關係。一方面，海神廟大殿使用白石大柱，似乎與同時推進的曲阜孔廟遙遙呼應（圖20）。另一方面，李衛曾在雍正八年三月的奏摺中，懇請清世宗安排京廠燒制門、殿及御碑亭使用的黃、綠琉璃瓦，並由運糧船帶回浙省。³¹⁴雖然清世宗的硃批言明：「據廷臣奏稱，外省祠廟用琉璃瓦者甚少，應照議毋庸製造。」³¹⁵但近年考古發現，御碑亭原址附近殘存大量黃色琉璃瓦遺存，且模有「浙省碑亭」的字樣，³¹⁶顯係京廠燒製，這種對於御碑亭的重視或可視為從武陟工程沿襲而來的傳統。2001年，海寧海神廟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圖20 海神廟正殿(左)及御碑亭(右)(陶金攝)

³¹² 海神廟的一些建築細部呈現出江南本地特色，諸如屋角起餞，但這也有可能是在太平天國之後的修繕工程中，本地匠人所做的改動。

³¹³ [清]李衛：〈雍正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一七四之十一，《四庫全書》，第423冊，頁311下。

³¹⁴ 同上註，頁312上。

³¹⁵ 同上註，頁313下。

³¹⁶ 周建初：〈海寧海神廟可移動文物調查〉，《東方博物》，第4期(2017)，頁76-83。

海神廟中的主祀之神為雍正十年所勅封之「寧民顯佑浙海之神」，³¹⁷ 並非是時應宮中的「東海顯仁龍神」，也非錢塘江一帶由來已久的「潮神」。所謂「浙海」當是指浙省所臨海域，如此或許可理解為位居東海龍神之下的地區性海神。就像時應宮中的龍神一樣，浙海之神並不見於前朝祀典，而是清世宗針對浙江海塘事務而勅封的新神。

雍正三年，也就是東海颶風之後第二年，清世宗勅封了江南地區最為著名的四位「潮神」：「封春秋吳國上大夫伍員為英衛公，廟祀錢塘縣；唐吳越王錢鏐為誠應王，廟祀臨安縣；宋張夏為靜安公，廟祀蕭山縣；明紹興太守湯紹恩為甯江伯，廟祀紹興府。」³¹⁸ 大夫伍子胥生前為吳相，死後則成為錢塘江最早的潮神，五代錢鏐王曾修理海塘，並留下「錢王射潮」的佳話，薨後被尊為潮神。清世宗將他們配饗於正殿「浙海之神」的東西兩側，後兩位潮神則與地方海塘諸神一同從祀於東西配殿內。³¹⁹ 這些地方諸神包括：越上大夫文種、³²⁰ 漢忠烈公霍光、晉橫山公周凱、唐潮王石瑰、升平將軍胡暹、宋宣靈王周雄、平浪侯捲簾使大將軍曹春、護國宏佑公朱彝、廣陵侯陸圭、靜安公張夏、轉運使判官黃恕元、平浪侯晏戍仔、護國佑民永固土地彭文驥和烏守忠、明甯江伯湯紹恩、茶槽土地興福明王陳旭，這些均為與海潮或水利有關的吳越地區的神明。

(ii) 祈禱活動

海寧海神廟自其落成之時，便已規定了以「每年春秋仲戊日」致祭。³²¹ 八月十八日海神聖誕，除了官方致祭外，「自十六日起禮懺、演戲，慶賀誕日」。³²² 雍正十一年，清世宗遣內務府大臣海望致祭，清高宗

³¹⁷ [清]昆岡等：《（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四四二（光緒二十五年刻本），頁三上。

³¹⁸ 同上註，卷四四五（光緒二十五年刻本），頁二上。

³¹⁹ [清]戰效曾：《（乾隆）海寧州志》，卷六（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頁七下。

³²⁰ 文種，字少禽，春秋楚國人，為越國之上大夫，後為越王勾踐賜死。《吳越春秋》云：伍子胥從海上穿出，協而持（文）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輯自海寧海神廟說明牌。本段其餘人物，詳參海寧海神廟說明牌。

³²¹ [清]昆岡等：《（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四四二（光緒二十五年刻本），頁四上。

³²² [清]戰效曾：《（乾隆）海寧州志》，卷六（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頁九上。

曾多次遣祭海寧海神廟，並於南巡時謁廟拈香。³²³ 據海寧袁鼎傑道長介紹，海神廟原有道士與海甯本地道士不同，前者號稱「家道士」，專由鹽官陳閣老（陳元龍）（1652–1736）家出資供養。從志書上所言「禮懺、演戲，慶賀誕日」來看，海神廟的道士應該與嘉應觀等處道士一樣，也為民間提供酬神的儀式服務。

2. 湖廣兩省的江神祠廟

(i) 創立始末

湖廣兩省的江神祠廟是清世宗專門為了崇奉長江之神而勅修的祠廟，分別位於湖北省城武昌和湖南省城長沙。雍正七年正月上元節，清世宗上諭禮部：「湖廣境內，西南數省之水匯入大江，又為川澤之總會。凡屬地土民人及舟楫行旅，皆仗江神默佑，保護安寧，允宜修建廟宇，按時致祭，以崇報享。」³²⁴ 此項任務分派給湖廣總督，會同湖北、湖南兩省巡撫勘察商議建設方案。³²⁵ 位於湖北者座落在武昌平湖門外，西倚大江，同治年間穆宗曾賜額「靈昭南紀」。³²⁶ 位於湖南者座落在長沙城小西門外湘江正中的橘子洲上，³²⁷ 原為元代濟應禪師（生卒年不詳）所創水陸寺，³²⁸ 雍正八年奉旨改為江神廟。³²⁹ 雖然清世宗在上諭中強調動用公帑來修建，但實際仍是由布政使趙城（1652–1736）捐資創立，並置辦香火田畝。³³⁰ 長沙江神廟現廟猶存，建築則已非歷史建築。

³²³ [清]戰效曾：《（乾隆）海寧州志》，卷六（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頁九上。

³²⁴ 〈雍正七年己酉正月十五日上諭〉，收入《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七七，《四庫全書》，第415冊，頁一八二下。

³²⁵ 雖然上諭中言明要在兩處建立廟宇，但在《大清會典事例》中僅見「遵旨於湖北武昌平湖門之外立廟崇祀，春秋致祭」。大抵因為長沙省城並非長江沿岸，而係湘江沿岸，故而並未寫入《會典》，位於長沙者應實為湘江神祠。[清]昆岡等：《（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四四二（光緒二十五年刻本），頁三上。

³²⁶ [清至民國]呂調元：《（民國）湖北通志》，卷二七（民國十年刻本），頁二上。

³²⁷ 關於長沙江神廟之研究，參見龐毅：〈長沙江神廟的歷史地理考察——兼及湘江流域水神信仰〉，《天中學刊》，第6期（2012），頁118–121。

³²⁸ [清]呂肅高：《（乾隆）長沙府志》，卷三五（清乾隆十二年刻本），頁二七上。

³²⁹ 同上註，卷十五（清乾隆十二年刻本），頁六下。

³³⁰ [清]趙文在：《（嘉慶）長沙縣志》，卷十二刻本（清嘉慶十五年），頁八七下。

(ii) 建築規制

武昌江神廟現已無存，其規制亦不可考。惟長沙江神廟在《長沙府志》中留存有圖像。其前為櫺星門，大門、二門以及正殿，即水陸寺所改建。廟後的拱極樓為長沙著名名勝。總體而言，長沙江神廟由湖廣總督及湖南巡撫督辦建造，且因為其地處橘子洲，且由佛寺改建，故而其建築形制與其他龍神祠廟完全不同。

(iii) 祀典源流

對於江神，清世宗並未勅封確切的神號，雖然他在上諭中所言乃是長江之神，但因湖南省城長沙毗鄰湘江及洞庭湖，並非長江，故《大清會典事例》中所載為「雍正八年……又建湘江神廟於湖廣長沙，春秋致祭。」³³¹ 據《長沙縣志》的《江神廟陳設圖》所見，其神主上只書「江神之神」四字，³³² 這既不是「湘江之神」，也不是北郊方澤壇上的「南瀆大江之神」，更非時應宮中「四瀆龍神」之一，其具體原因尚不清楚，也許是地方對於祀典的不同理解。

(iv) 祈禱活動

至於武昌、長沙兩處江神廟官方祭祀的日期，目前所見僅《（乾隆）長沙府志》載：「每歲祭期，地方官詳擬。」³³³ 可見，並未規定統一的春秋致祭日期，但在稍後刊行的《長沙縣志》中，對官祭儀式做了較為詳盡的記載，此應與上述其他龍神祠廟祀典一樣，經歷了逐步完善。³³⁴ 此外，雖然清世宗在上諭中稱：「並令該督撫曉諭居民，不得私結社會，妄事祈求，以滋褻慢。」³³⁵ 但就長沙地方來看，江神廟同時也獲得了民間的認同。由於江神廟係由水陸寺改建而來，故亦由僧人負責住持管理。民間多次集資重修江神廟，並增建戲樓，廟後的拱極樓則

³³¹ [清]昆岡等：《（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四四三（光緒二十五年刻本），頁四上。

³³² [清]趙文在：《（嘉慶）長沙縣志》，卷十二（清嘉慶十五年刻本），頁八六下

³³³ [清]呂肅高：《（乾隆）長沙府志》，卷十五（清乾隆十二年刻本），頁六下。

³³⁴ [清]趙文在：《（嘉慶）長沙縣志》，卷十二（清嘉慶十五年刻本），頁八七上至頁九一下。

³³⁵ 《雍正七年己酉正月十五日上諭》，收入《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七七，《四庫全書》，第415冊，頁一八三上。

成為了文人雅聚之處，再加上橘子洲碼頭的興旺，這都使長沙江神廟成為一處宗教與社會生活的交集所在。³³⁶

(f) 小結

上文逐次開列了時應宮、宣仁廟、凝和廟、昭顯廟、各省及熱河龍神祠廟、武陟嘉應觀、皂河龍王廟、蘭陽惠安觀、陳留溥仁觀、循化河源廟、海寧海神廟、武昌江神廟以及長沙江神廟，總計31處祠廟的大致情況，現小結於下。

以時應宮為中心的各省龍神祠廟(包含熱河福邊龍神)，其創立的核心目的在於為皇帝及地方督撫祈禱雨暘，進而解決日益嚴峻的糧食危機。在京師內，還形成了「風雲雷雨」四廟的小型內府雩禮系統。河南及江南黃河沿岸四處祠廟的創建目的在於永鎮安瀾，它們均位於曾經決口之處，黃河大溜曾就武陟及蘭陽兩處決口直接北溢，淤堵運河，阻塞了大運河這一國家命脈，皂河龍王廟則處於黃運交匯的要衝之地。海寧海神廟位於錢塘江大潮最為洶湧的北岸，與黃河沿岸類似，同取安瀾之意。此外，清世宗在上諭中稱其勅修湖廣兩省的江神廟與循化河源廟是為了崇奉神明、佑護一方之安康，其勅修時間也正分別對應了西北平準，兩廣改土歸流之際；而熱河龍神祠廟則有聯絡蒙古諸部之潛在用意。

目前現存的北京宣仁廟、凝和廟以及昭顯廟建築，體現出了高度的一致性，這是一個以時應宮為藍本的京內建築體系，而武陟嘉應觀、皂河龍王廟以及海寧海神廟皆以官式風格營造而迥異於各自所在地方的建築風格，在建築佈局上高度相似，這是另一個以嘉應觀為藍本的地方建築體系，其特徵是主殿皆為重簷歇山頂，並特別強調御碑亭的設置，具有極強的紀念性。其中前兩者皆由河督齊蘇勒經理，後者則因浙江總督李衛借調曾經參與武陟廟王的王元清，沿襲了河道祠廟的規制。蘭陽惠安觀應也屬於這一建築系統，惜其建築已無存。

北京時應宮內曾供奉34位龍神，均不曾載於歷朝祀典，皆係清世宗所新立。其中四海、四瀆龍神是對既有山川祭祀系統的轉化，而以京畿龍神為中心的十七省龍神，則參照了明太祖所構建的城隍廟系

³³⁶ 龐毅：〈長沙江神廟的歷史地理考察——兼及湘江流域水神信仰〉，頁118-121。

統，也是對大清版圖在神學意義上的一次界定。此外，邊外龍神的崇祀更體現了清代帝王通過懷柔蒙古諸部經略邊疆的政治理想。雍正五年，通過將十七省龍神送至地方督撫供奉，清世宗將這一龍神系統在物理空間上擴展至全國，形成了行政區劃上的龍神網路，京畿龍神在實際意義上等同於「天下都龍王」。配合四瀆、四海龍神，清世宗實際將保佑一方雨暘時若的十七省龍神與永鎮安瀾的河、海龍神都統攝於都龍王旗下，原本各為中心的龍神崇祀系統被建構成一個「一體」的系統，時應宮因此成為皇帝一人與天下龍神溝通的樞機。該宮後殿八方龍神的增建，進一步將京畿龍神納入九宮九州的「明堂」系統，這一系統甚至超越了固有的十七省範疇，使皇帝的祈禱能夠更為有效地傳達至天下每一處土地。

在黃河一線，通過嘉應觀的建立，金龍四大王被官方默認為黃河河神，進而為京畿龍神所統攝。此外，從雍正年間開始，逐漸形成了以大王統攝將軍的地方信仰系統，隨著大王與將軍數目的增多，最終在清末形成官方認可的祀典系統。在浙江海塘，通過海神廟的建立，歷代官方及民間所崇奉的潮神配饗或從祀於清世宗新勅封的「浙海之神」兩側，從而也隸屬於京畿龍神。在河海層面，廟宇內所供奉的神明盡大限度地趨從了地方民眾之所向，京師的皇帝得以與直省督撫、地方百姓直接聯通。

以時應宮為主的京師風雲雷雨四廟，除了每年的專祀外，還在祈雨之時由內府舉行一套平行於南郊雩禮的「小雩禮」，若遇皇帝親禱雨暘，則由道眾啟建誦經道場，焚化疏文。作為大內重要的皇家宮觀，時應宮也成為皇帝日常臨幸拈香的道場，每逢元旦、萬壽節，則啟建祈祥道場。作為時應宮在地方上的投影，各省龍神祠廟則成為督撫歲時祭祀、祈禱雨暘，朔望拈香的壇所，這些官吏甚至效仿帝王於亢旱之時步禱祈雨。與時應宮不同的是，這些龍神廟有時也成為地方百姓自發祭祀、祈雨的場所。在黃河與海塘層面，龍神廟所祀之神本身具有鮮明的地方性，因此更能夠與地方社會相契合，成為一方的信仰焦點與宗教活動中心。這也正實現了清世宗「令遠近人民，奔走瞻仰，興起感動，相與服教畏神，遷善改過，永荷庥祥」的願望，實踐了上下一體的「事神治人之道」。³³⁷

³³⁷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上諭〉，頁328上。

清世宗在創立循化河源廟與湖廣兩省江神廟的上諭中隱含了真實意圖，其根本創立動機當是用以佑護邊疆的平定與改土歸流的順利實行，這與黃河河工、浙江海塘同為當時清世宗心中的國之要務。

四、九州清晏：清世宗的政治理想

(a) 與前朝祠廟系統之異同

綜上所見，由清世宗所創立的龍神祠廟系統有其獨特的背景與用意，迥異於前朝皇帝所設立的祠廟系統。唐宋時期的皇帝立足於個人的虔誠道教信仰，意欲宣宏大道，並上溯家族的神聖來源，著眼於皇權合法性的樹立與展現。如此才有李唐老子之追贈，趙宋天降祥符之瑞現，以及唐玄宗玄元皇帝廟³³⁸與宋徽宗神霄玉清宮³³⁹系統之設立。這兩套系統都配有高等行政級別，以及教育、傳播之功能，同時設立御容或御碑，將帝王的存在感通過宗教空間網絡直接傳達到地方民眾。

明太祖所創立的城隍廟系統與前朝自上而下的作法不同，此時「民眾的宗教已經演化成了王朝的宗教」，³⁴⁰他便利地借用民間早已流行的城隍崇拜，將其納入地區行政級別，由此第一次出現了一個與帝國行政系統完全鏡像的城隍系統。³⁴¹在這個系統中，京都城隍神（後來亦被稱為都城隍）成為了天下城隍之主，代替東嶽，統攝城隍諸神，³⁴²國家在收納民間崇拜的同時，也將其系統化、制度化。明太祖起身戎馬，不需要靠上溯血緣來樹立皇權合法性，也缺乏宣揚某一特定宗教、門派之信仰的興趣，他所創立的城隍神系統是一個效忠於天子的神團。它能夠彌補陽世官吏監管不足的陰官監察系統，進而在實

³³⁸ 參見丁煌：《漢唐道教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54-156；雷聞：《郊廟之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頁101-132。

³³⁹ Shin-yi Chao, "Huizong and the Divine Empyrean Palace Temple Network," in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 eds.,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324-358.

³⁴⁰ 勞格文 (John Lagerwey) 著，蔡林波譯，白照傑校譯：《中國社會和歷史中的道教儀式》（濟南：齊魯書社，2017），頁327。

³⁴¹ 濱島敦俊著，朱海濱譯：《明清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頁114-129。

³⁴² 張傳勇：〈都城隍廟考〉，《史學月刊》，第12期（2007），頁45-51。

際生活中通過道德來約束民眾行為，最終達到教化的目的。他曾言明：「朕設京師城隍，俾統各府州縣之神，以鑑察民之善惡而福禍之，俾幽明舉不得倖免。」³⁴³ 由藩王入統的明世宗面臨群臣對其皇位合法性的挑戰，雖然並未構建新的神學、祠廟系統，卻通過依照古制，恢復明堂大饗禮，建立了為數可觀的道教化明堂建築樣本，從而完成了他以「神、王兩道」治理天下的政治理想。道教化明堂不僅與他作為道化君主「萬壽帝君」的身份呼應，更是他以天子和道教法師的身份祈晴禱雨的神聖空間。³⁴⁴

與前朝的祠廟系統相比，清世宗的龍神祠廟系統在出發點上與明太祖的城隍廟系統十分接近，都是為了最終實現明確的政治理想，而非將個人宗教信仰推行至地方。在建立信仰系統上，清世宗效仿明太祖，將其與國家政區相結合，擴展到省一級層面，從而形成了「中央——直省系統」。在這一系統中，清世宗與明世宗相仿，將自己定義為上天與人間之間的中介，專門在京師時應宮內為全國祈禱。他同時又將各省龍神神像派送至省城立廟安奉，由此將皇帝的祈禱神權分享給封疆命官，使之成為督撫為本省祈禱的壇所。也正是因為這種定位，各省龍神祠廟始終未能像城隍廟那樣與地方社會發生深度且持續的聯繫，以至於百年之後，大家對於這一曾經存在的祠廟系統已經全然不知。

清世宗龍神祠廟系統的另一分支可視為「河海系統」，這些神祠雖然座落地方，但相對獨立於各省龍神祠廟，尤其是黃河與海塘沿岸。在這一系統中，清世宗通過建立並整合祀典，將原本相對零散的地方神崇拜納入新的龍神系統中，從而實現了上至君王、下至黎庶的「一體」敬神的理想。河海系統的祠廟大都建立在曾經決口垮塌之處，以較高的建築等級修造，並建有御碑亭。張劍葢先生在其對於北京白浮泉龍王廟的研究中建設性地提出了「水利設施——龍王廟」這一研究模型，探討了龍王廟在這一模型中的三個層面：(1) 以祠廟為載體的日常管理建築，(2) 社會公共生產與生活的紐帶，(3) 治水的建築象徵

³⁴³ [清]稽璜：《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七十九，《四庫全書》，第628冊，頁231上。

³⁴⁴ 陶金、喻曉：〈明堂式道教建築初探——明世宗「神王」思維的物質載體〉，頁177-198。

與權威空間體現。³⁴⁵ 以此觀之，河海系統的祠廟因為河道總督之駐地而成為廟宮，成為地方百姓災後的心理撫慰。祭祀活動使這些祠廟成為地方社會活動的中心，成為督撫們整合地方力量，維護水利設施的平台。對於清世宗而言，敬神是其安鎮水患的重要方式，而祠廟本體更是宣揚皇帝本人神功聖德的直接體現。

清世宗所創立的龍神祠廟系統既不是唐宋帝王的個人信仰的表達或皇權合法性追溯，也不是明太祖的陰司監察，它更像是明世宗的祈雨明堂——讓皇帝、督撫及百姓祈禱產生效應的神聖空間。但它又更具有社會性：將不同空間、不同層面的人神關係巧妙地編織起來。明世宗提出了以「神、王二道裁理天下」的政治理想，但他終究沒能走出皇城。清世宗則將這一理想真正實踐，並最終在全國範圍內得到施行。³⁴⁶

(b) 與本朝施政綱領之同步

清世宗經常上諭臣工，表明自己從來不言祥瑞。然而清世宗並非不言祥瑞，而是「不輕言祥瑞」。他提到過的祥瑞發生地，皆是他推行新政的關鍵地區，且由他的股肱之臣主要負責，這也與他設立龍神祠廟有著同步對應的關係。

1. 各省龍神祠廟：各省督撫與糧食危機

清代中期所遭遇的人口爆炸以及糧食危機使得清世宗將糧食生產擺在了一切工作之前。時應宮的設立旨在建立一處皇帝本人能夠直接干預各省氣候的神聖空間，而清世宗本人對於其作為天子的祈禱能力十分自信。雍正三年四月，他發上諭說：「如今年三月十六日，覽署山西撫伊都立奏摺，知平陽地方三春少雨，朕懷甚為憂慮。祇告神明，齋心虔禱。續據伊都立奏報，於十八、十九、二十等日得雨霑足。三月二十九日，覽河南巡撫田文鏡奏摺，知開封一帶地方亢旱。朕於四月

³⁴⁵ 張劍葳：〈白浮泉、都龍王廟與龍泉寺〉，頁629-631。

³⁴⁶ 陶金、喻曉：〈明堂式道教建築初探——明世宗「神王」思維的物質載體〉，頁197。

初一日禱於神明，竭誠致敬，刻不敢懈。昨田文鏡奏報，初三日開封四境果得時雨，可見天人感通之理，捷於影響。」³⁴⁷ 雍正五年，世宗將各省龍神像移送省城立廟供奉，而祈禱靈應的報告也從省級層面呈現出來。雍正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山西巡撫石麟奏稱：「普省雨水缺少……臣與各屬俱各虔誠修省，設壇祈禱。今省城太原府於四月二十一日得雨寸許，又據各屬陸續申報……等州縣均得雨霑足。」³⁴⁸ 據《（雍正）山西通志》載：「龍王廟……中奉山西『福晉宣澤王』神位，神像法身由內府塑造，虔供廟中……凡有祈求雨澤，熏壇步禱，甘澍立沛，靈應如響。」³⁴⁹ 此外，清世宗常以田文鏡所管理的河南作為天人感應的標杆勉勵其他巡撫，清世宗硃批上引石麟奏摺云：「河南與晉省接壤……一切刑名、錢穀、驛站、塘汛井井有條，河工堤岸修築鞏固，直省中實為第一整理省分，而年來雨暘應時，連獲豐收，徵驗亦遂不誣。」無獨有偶，清世宗增訂「耕藉禮」，並向各州縣推行，瑞谷遂豐現於京師先農壇藉田之中。³⁵⁰ 降雨與瑞穀祥瑞的背後，是清世宗對於糧食危機的深切焦慮。

2. 黃河龍神祠廟：齊蘇勒與治理黃河，田文鏡與「一體當差」新政

治黃是清世宗工作清單上又一項重要任務，康熙末年以來，河工弛懈，隱患百出。武陟沁黃交匯處決口的填堵工程是清世宗登基伊始的當務之急，他一方面重新委派齊蘇勒為河道總督巡視河工，另一方面下令勅建嘉應觀，這兩項工程均由齊蘇勒主要負責。後來的河南巡撫田文鏡則負責具體落實，他曾在河南推行「攤丁入畝」、「官紳一體當差」的新政。二人皆為一時能吏，是清世宗的心腹之臣，最終皆因積勞成疾而病歿於雍正朝中。雍正三年，嘉應觀與武陟一段的河堤整

³⁴⁷ 〈雍正三年乙巳四月十一日上諭〉，收入《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三十一，《四庫全書》，第414冊，頁272上。

³⁴⁸ [清]石麟：〈雍正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二一七之二，《四庫全書》，第425冊，頁645下。

³⁴⁹ [清]儲大文：《（雍正）山西通志》，卷一六四（清雍正十二年刻本），頁五下。

³⁵⁰ 〈雍正四年丙午八月丙戌上諭〉，收入《世宗憲皇帝聖訓》，卷二十五，《四庫全書》，第412冊，頁335下。

修工程幾乎同時竣工，自此之後這裡再未發生決口之災。雍正四年臘月，黃河澄清達三十六日之久。對於這一次的「大型」祥瑞，清世宗專門發上諭，一方面推辭了升殿朝賀的請求，一方面勉勵臣工「和衷共濟，矢勤矢慎」。³⁵¹ 他還上諭齊蘇勒，命其於江南黃河沿岸擇地勅修龍神祠廟。雍正五年，黃河蘭陽決口又現關帝神像堵口的神蹟，清世宗馬上發上諭，勅修惠安觀。此外，雍正十三年請勅溥仁觀的河東總督王世俊正是接替田文鏡在河南推行新法的清世宗的股肱之臣。可以說，黃河沿岸的諸龍神祠廟，是皇帝與河臣、督撫們共同建立起的系列聖蹟，而這背後則是朝廷全面接管黃河河務，組織修護堤防的歷史進步。

3. 海寧海神廟：李衛與海塘治理及「攤丁入畝」新政

清世宗向來對浙江存有偏見，他在設立「觀風整俗使」的上諭中稱：「朕聞浙省風俗澆漓，甚於他省，若不力為整頓挽回，及其陷於重罪，加之以刑，實有不忍。」³⁵² 雍正二年，颶風攜海水沖潰堤防，清世宗認為：「水患雖關乎天數，或亦由近海居民平日享安瀾之福，不念神明庇防之力，傲慢防瀆者有之。……若百姓果能人人心存敬畏，必獲永慶安瀾。」³⁵³ 雍正三年，李衛調任浙江總督，一面修築海塘，一面推行「攤丁入畝」的新政。雍正七年，李衛丁憂期間，海塘化險為夷，清世宗於是勅修海神廟，他不僅將海神廟視作永鎮安瀾的敬神之所，更是推行教化的媒介，而其背景則是李衛在浙江的海塘與新政上的勤懇經營。

4. 湖廣江神廟：邁柱與「改土歸流」新政

雍正六年，鄂爾泰被任命為雲貴廣西三省總督，負責推行改土歸流，隨著進程的推進，鄂爾泰的岳父邁柱(1670–1738)於雍正七年上任湖廣總督，配合鄂爾泰在湖廣兩省推進改土歸流，此翁婿二人亦皆為清

³⁵¹ 〈雍正五年丁未正月十三日上諭〉，收入《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五十二，《四庫全書》，第414冊，頁525下。

³⁵² 〈世宗憲皇帝實錄〉，卷四九，《清實錄》，第7冊，頁737。

³⁵³ 〈雍正二年八月十四日上諭〉，收入《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二三，《四庫全書》，第414冊，頁195上。

代之著名能吏。湖廣兩省江神祠廟的勅建，則正在這一大的背景之下同時進行。清世宗勅建兩省江神廟的動機來自其先前修繕北鎮廟的經歷，他在上諭中說：「山川之神，錫福於地方百姓。是以自古帝王，皆誠心展祀。……康熙五十九年，朕……謁北鎮廟，潔蠲致祭，因捐貲庀工，載修廟宇，囑令地方官員虔恭致祭。自康熙六十年以至於今，盛京年谷悉登豐稔。」³⁵⁴ 在這道上諭背後，實際是湖廣地方改土歸流之後的拓荒耕田大局工作。雍正十一年十月，清世宗公佈了湖廣改土歸流以來的第一個祥瑞：「今據湖廣鎮筵總兵官楊凱奏報：鎮筵紅苗，甫經向化，今年苗民所種之山田水地、黍稷稻粱、盈疇遍野。及至秋成，則皆雙穗、三穗、四、五、六穗不等。萬畝皆然。苗民額手權呼，以為從來未有之奇瑞等語。」³⁵⁵ 對於清世宗來說，苗民學習耕作是其歸化之後生存之根本，也是邊塞軍儲之重計，在苗民重新經營之伊始，多處豐收並呈現瑞穀，這正是他勅建江神廟時所期望的。

5. 循化河源廟：川陝總督與平定青海、準格爾之役

雍正二年五月，撫遠大將軍年羹堯(1680–1726)在平定青海和碩特蒙古羅卜藏丹津叛亂之後，擬定《善後事宜十三條》、《禁約青海十二事》和《防守邊口八款》，得到清廷批准。其中，前兩條促成了安撫青海蒙古諸部的「青海辦事大臣」的設立，³⁵⁶ 後一條則是為了確保甘肅地區的安全，隔絕準格爾與青海的通道，重新經營明代放棄的嘉峪關外的沙州、瓜州一帶地區，設立了安西鎮。雍正三年，年羹堯被賜自盡，岳鍾琪旋接任川陝總督。為了應付西北日漸吃緊的軍需，他建議清廷從嘉峪關內移民兩千四百戶至沙州屯墾，從此形成了下轄安西、沙州、柳溝、靖逆、赤金五個衛所的肅州道，嘉峪關外的漢族人口日漸興旺。³⁵⁷

³⁵⁴ 〈雍正七年己酉正月庚申上諭〉，收入《世宗憲皇帝聖訓》，卷三二，《四庫全書》，第412冊，頁425下。

³⁵⁵ 〈雍正十二年甲寅十月戊辰上諭〉，收入《世宗憲皇帝聖訓》，卷二五，《四庫全書》，第412冊，頁345上。

³⁵⁶ 周偉洲：〈西寧辦事大臣考〉，《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第1期(2011)，頁32–41。

³⁵⁷ 劉傳飛：〈清康雍乾時期嘉峪關以西地區郡縣制的擴展與鎮迪道的形成〉(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羅卜藏丹津(生卒年不詳)潛逃準格爾之後,清廷一直擔心準格爾的噶爾丹(1644-1697)策零會擇機犯境。雍正八年四月,清廷大軍已準備開赴準格爾與噶爾丹策零大戰,世宗此時發出上諭,意於黃河流入中國的西寧地方,「特建廟宇,專祀河源之神」。³⁵⁸ 兩個月之後,「河州有慶雲捧日之瑞,自午至申,萬眾瞻仰」。又一月後,河州積石關外(即河源廟所在),「見河流澄澈,上下百有餘里,徹底瑩潔,凡三晝夜」。³⁵⁹

雍正十一年額爾多尼昭戰役,噶爾丹策零大敗,遣使言和,清廷也因國庫空虛,於五月決定停止進軍。就在清廷決策止戈之際,四月十七日,清世宗上諭:「年來陝、甘二省地方,仰賴河源之神默垂佑,暘雨應時,民人樂業,朕心實深感激,理宜虔誠致祭,以答神貺。」³⁶⁰ 隨後,世宗欽點內閣學士德新(1684-1752),前往青海致祭河源廟。德新於七月二日抵達河州,初五日抵達循化營,據蘭州巡撫許容稟報:「彼時循化營一帶地方半月未雨,屬望正殷。初五日欽差大人甫入公館,即陰雲四起,甘霖普降,歷未、申、酉三時,入土五寸,羣歌沾足,至夜半交。次日初六子時,天氣晴朗,欽差大人,必誠必敬,黎明致祭。」³⁶¹ 在平定準格爾的戰爭背景下,再考慮川陝總督岳鍾琪移民重新設立肅州道,西寧辦事大臣宣化青海地方等因素,清世宗通過創立河源廟,不僅僅是為了保佑一方雨暘時若,以利軍需,更是中原王朝對於重新回歸版圖的一種主權宣示。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從熱河避暑山莊邊外龍神祠廟所處之位置與封號可以推論,其祀典之建立直接對應了康熙年間所開始的與蒙古諸部的會盟、狩獵以及賑濟等事務。作為滿洲入主中原後的第三任統治者,清世宗將以中原為主體的龍神系統覆蓋到滿洲、蒙古文化區域,展現了清代帝王較元明兩代更高的政治視野與胸懷。

³⁵⁸ 〈雍正八年庚戌四月丁未上諭〉,收入《世宗憲皇帝聖訓》,卷三二,《四庫全書》,第412冊,頁428上。

³⁵⁹ 〈河源神廟碑文〉,收入《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卷十六,《四庫全書》,第1300冊,頁129上。

³⁶⁰ [清]許容:〈雍正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奏摺〉,收入《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二一二下,《四庫全書》,第424冊,頁855上。

³⁶¹ 同上註。

綜上所述，清世宗的龍神祠廟系統的地理構成並非偶然或隨機，它們分別對應著雍正一朝一系列新政與軍事項目。其廟宇之營造祭祀，也往往由這些項目的主要負責大臣直接參與。雖然清世宗強調「從不言祥瑞」，但龍神祠廟所在地區卻偏偏是祥瑞的高發區。

(c) 清世宗內心的政治理想

圓明園是清世宗藩邸時期的別墅，在他登基後，成為皇帝的御園，是紫禁城外的另一個執政中心。雍正元年，甫一登基的清世宗便將圓明園內的寢宮命名為「九洲清晏」。³⁶² 雖然他並未解釋如此命名的原因，但清高宗後來撰寫的《圓明園四十景圖詠詩》指出：「所志維何？煌煌御書。九州清晏，皇心乃舒。」九州是自古以來中原的代稱，而清晏指的是河清、海晏兩種瑞像，寓意著太平盛世，這體現了雍正希望在他的治理下，中國能夠風調雨順、安定和諧，進入一個太平盛世（參見圖 21）。

繼位之初，清世宗面臨的是一個軍事、政治上雖然統一，但文化依舊對立、吏治不良且國庫空虛的龐大國家。其本人繼承大統，既不符合滿洲傳統，亦未按照儒家傳統，故遭受質疑。作為皇帝，清世宗人生最後的十三年一直在通過「朝乾夕惕」的努力工作和對「人天感應」的不懈追求，試圖證明由滿洲人、特別是由其本人來統治這個多民族帝國，是對天心民意的順應。

在短短十三年的執政期間，清世宗推行一系列政治、經濟、軍事政策，鞏固了清帝國的執政根基。他完成了清代國家祭祀的大部分構建工作，特別是創新性地構建了將東北地區亦包含在內的全國性龍神祠廟系統，並親身參與向龍神祈禱的宗教活動。明世宗在他於皇城中所構建的明堂道教建築系統中，陶醉於「神、王二道裁理天下」，清世宗卻在全國各省和各重點水利工程建設了龍神祠廟，成為了向天下民眾宣示其可以達成「人天感應」的「紀念碑」。在這些祠廟舉辦的一次

³⁶² 清世宗為該建築御題的匾額作「九洲清晏」，但清高宗的御制詩和其他宮廷文獻中州、洲混用。北京師範大學王開璽教授認為，兩字混用只是文字假借，並無特殊用意。詳見王開璽：〈圓明園「九洲清晏」與「九州清晏」問題之我見〉，《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第4期（2015），頁157-160。

次祭祀活動中，清世宗的「政治合法性思維」逐漸滲透到民間。清世宗一直盼望「君臣上下各盡其道、各殫其誠」，³⁶³ 共同努力實現自然環境、社會環境雙重意義下的「九州清晏」，龍神祠廟則成為這一理想的重要物質寄託。



圖 21 圓明園舊藏「九州清晏之寶」³⁶⁴

³⁶³ 〈雍正七年己酉六月甲辰上諭〉，收入《世宗憲皇帝聖訓》，卷二，《四庫全書》，第 412 冊，頁 23 下。

³⁶⁴ 乾隆朝 (1736–1795) 製作，10.9cm 見方。2009 年 4 月 29 日，法國博桑－勒費福爾拍賣行以 138 萬歐元拍出。博桑－勒費福爾拍賣行官方網站：Jiu zhou qing yan (Paix et tranquillité sur les neuf continents)。https://www.beaussant-lefevre.com/en/lot/3061/934986?sort=ebd&，2020 年 11 月 7 日查閱。

附表 雍正朝勅封/加水神神號統計表

時間	各地神明	勅封神號
雍正二年	勅封四海龍神	東曰顯仁、南曰昭明、西曰正恒、北曰崇禮
	勅加四瀆封號	江曰涵和、河曰潤毓、淮曰通佑、濟曰永惠
	大沽海口之神	勅加「廣惠封號」
	勅封洞庭湖神，立廟湖廣常德府	勅加「涵元匯利」四字
	雲南各鹽井神	普潤龍王之神
雍正三年	臨清州河神	福漕漳河之神
	館陶縣河神	惠濟漳河之神
	青海水神	靈顯青海之神
	海塘神春秋吳國上大夫伍員	英衛公
	海塘神唐吳越王錢鏐	誠應王
	海塘神宋張夏	靜安公
	海塘神明紹興太守湯紹恩	甯江伯
雍正五年	石景山渾河龍神	永定河神
雍正六年	河東鹽池	昭惠裕阜鹽池之神
雍正七年	浙江寧波府鎮海縣蛟門山龍神	勅加「涵元昭泰鎮海」封號
	甘肅寧夏大渠正牐龍神	甯渠普利龍王之神
雍正八年	西寧河州口外建河源神廟	開津廣濟佑國庇民昭應河源之神
	直隸滹沱河	長源永濟滹沱河神
雍正九年	甘肅寧夏大清、漢、唐三渠	甯渠普利龍神
	建新廟於石景山南龐郵告成	直隸永定河神
雍正十年	浙江海寧州海神	寧民顯佑浙海之神
雍正十二年	廣西郁林州，以湧泉著異	昭德沛澤泉源之神

The Pure Yellow River and the Peaceful Seas of the Nine Territori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ate Network of Dragon King Shrine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Shizong of Qing Dynasty

Tao Jin and Yu Xiao

Abstract

Since the first year of his reign (1723), Emperor Shizong of Qing Dynasty (清世宗), in his thirteen years of reign, had established an enormous state network of some thirty Dragon King shrines, centered with the Shiyong Gong 時應宮 (the Temple of Timely Responses) in Beijing. He not only prayed at the temple for rain or sunshine for those stricken areas suffering from flood or drought, but also had provincial governors receive Dragon King statues imperially commissioned to their territories, and erect shrines to house them, being the local branches of the Shiyong Gong. This essay categorizes these shrines into five levels: the central state, the provinces, the occasion of rainmaking ceremony, the Yellow River, and other rivers and seas. It analyzes the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these shrines and the state policy and the monumentality of these shrines by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rchitectural forms, the genesis of the cults, and ritual activities. Furthermore, the essay aims at revealing the self-coincidence in divine power of Emperor Shizong as the lord of the “central state,” and his political ideal of achieving “Jiuzhou Qingyan” 九州清晏 (the pure yellow river and the peaceful seas of the nine territories) by serving the gods and ruling the people.

Keywords: Emperor Yongzheng of Qing dynasty, Dragon King, Rain Rituals, Yellow River, Flood, Imperial Sacrifices, Sacral Architecture